

毛泽东思想 新论大纲

龚育之 石仲泉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毛泽东思想 新论大纲

上海辞书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0 号

封面设计：江小铎(精装本)

华 洁(平装本)

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

龚育之 石仲泉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5 字数 159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5326-0298-2/A·4

定价：平装本 6.60 元 精装本 9.8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作者为《毛泽东思想大辞典》写的领头条目“毛泽东思想”。该条目以中共十四大报告为指导，从新视角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路程、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为便于更多读者用作学习、宣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参考，特以单行本出版。

书中所有引文的出处，除注明版本者外，均据最新版本。

目录及提要

一、导言：中共十四大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视角 … 2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创造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拨乱反正、重新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认识的庄严任务，即：拨林彪、“四人帮”的歪曲破坏之乱，拨“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之乱，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正如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贬低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已经产生了重大成果一样，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旗帜，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当代有了重大发展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路程 …… 13

（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 13

(二)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创立者的个人特质·····	18
(三) 毛泽东思想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 道路的探索·····	24
(四) 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中创立·····	36
(五) 延安时期·····	45
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和取得全党共识的原因 和基础	
毛泽东思想成熟和展开的诸多方面	
(六) 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	55
毛泽东思想在民主革命全国胜利和向社会主义 过渡胜利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九五七年以后“左”的错误对毛泽东思想发 展的干扰,在这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	
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 ·····	75
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历次概括和多种可能的概 括方式	
第二个历史决议所作的概括更能体现毛泽东思 想的实践性、民族性、创造性和层次性	
(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79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以长期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和农村包围城市 为主要特点的中国革命发展的独创道路	
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	
(二)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88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国民经社会主义改造的
理论

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三) 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 104

(四) 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112

(五)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121

(六) 关于党的建设理论 131

四、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141

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的背景和意义

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个概念,并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要点,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科学阐发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三个要点统一的雏形

(一) 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46

(二) 关于群众路线 153

(三) 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161

三个要点统一的最高概括

五、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170

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晚年错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必

要性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并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理论上有新的创造和开拓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表现在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在理论思路、理论性格、理论内容上有共同性和连续性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不只是细小的量的增加,而是显著的阶段性的飞跃

同毛泽东思想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是开放的和发展的

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出理论概括而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①

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毛泽东思想也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以新的实践和认识对它进行新的阐发，并赋予它新的时代内容。当中国现代历史进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90年代，当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和巨大发展的时候，这一点尤其必要。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773页。

一、导言：中共十四大与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新视角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从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确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提出了坚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和统一全党思想的战略任务，从而为我们党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场新的革命，确立了新的理论，举起了新的旗帜。中共十四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把一百多年来受尽外国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

史的新纪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始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其目的是要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使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中国充分体现出来。

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革命，这是中共十四大对党的七十多年历史的一个新概括。

这里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就这代中央领导的成熟性而言的。在党的历史上，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以前，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尽管取得过开拓性的重大成果，其历史意义不可磨灭，但是无论在革命理论上和革命实践斗争中都没有成熟。作为这种状态的反映，从陈独秀到博古（秦邦宪）的几届中央领导都不能说是成熟的领导。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我们党在总结过去成功和挫折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成熟起来，革命事业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深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革命的胜利和理论的成熟，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赢得崇高威望。这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我们党达数十年之久，社会主义新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是这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功绩的伟大丰

碑。虽然后来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中发生了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过失，但是历史地看，功绩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后来的过失虽然是严重的，毕竟属于第二位。

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是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也是就其成熟性而言的，因为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是不成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又一次伟大转折。这次会议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十几年来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性，证明了它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

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了两次伟大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十三大报告说：“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①

^①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56页。

“两次伟大革命”是从实践上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上讲的。两个提法的思路是一致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段时间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属于哪一次飞跃呢？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说，它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第二次飞跃的准备；从实践上说，它是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第一次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既有重大发展又曾遭到偏离和歪曲。建国以后近三十年中，我们党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成就和失误曲折交错，带来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党正是从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了科学认识，并且在新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使毛泽东思想获得了新的重大发展，这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经对毛泽东思想作出明确界定，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通过同党的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比较，从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论列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第一次阐述了毛泽东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在这个基础上，刘

少奇在中共七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进一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直是我们党认识毛泽东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依据。

但是，一方面，由于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在夺取全国胜利、完成民主革命和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各方面有新的发展，因而需要作出新的论述；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后来在探索中犯了错误，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歪曲和篡改，特别是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当作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来宣扬，还由于粉碎“四人帮”以后仍然存在“两个凡是”即实质上坚持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潮，这就提出了一个拨乱反正、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庄严任务。在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问题上，包括拨乱和反正两个方面。拨乱，即：（一）拨林彪、“四人帮”的歪曲破坏之乱；（二）拨“两个凡是”的错误态度之乱；（三）“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①。反正，即“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②，“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③。

早在1975年，邓小平在中央主持工作实行整顿的时候，就针对林彪、“四人帮”，提出了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④的问题。1977年，他又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⑤的问题。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认真地开始了这个拨乱反正。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55页。

④ 同上书第34页。

⑤ 同上书第39页。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即第二个“历史决议”)基本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个决议明确地具体地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内容,并且把它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区别开来,重新界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涵义,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科学成果,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①决议在肯定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的同时,以党的决议的形式第一次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②决议还详细论列了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多方面的内容”和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这个决议是我们党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成果,它具有经过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真理的权威,又具有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和确认的组织的权威,是我们今天认识毛泽东思想、研究和宣传毛泽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783页。

② 同上书第773页。

东思想的科学依据。

邓小平在指导起草这个决议的时候,强调起草工作的第一条方针就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决议,还有中共十二大报告、中共十三大报告,不断地、日益深入和展开地阐发了新时期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成果,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和理论。1989年5月,邓小平强调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②他还说:“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③“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④我们今天也不能躺在前人的书本上,而要以前人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面对新的实际去进行新的创造。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党的十四大认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四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系统论述了这些年来指导我们取得这些实践成就的路线方针和理论创造,庄严宣布: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① 参见《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4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参见同上书第25页。

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概括起来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又把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绝不意味着抛弃或贬低马克思主义，而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已经产生了新的理论，中国革命的自己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引导中国第一次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自己的旗帜上。如同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贬低马克思主义一样，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并不意味着抛弃或贬低毛泽东思想，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在当代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新的理论。举起这面新的旗帜，按照十四大报告的说法，就是举起“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旗帜”，或者说是举起一面引导中国第二次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旗帜。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又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为形成中国自己的新的理论作了很大努力，有重要的贡献，但是没有完成这项任务。十四大报告说：十四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个理论，第一次比

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回顾我们党对走过的历史道路的不断反思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不断审视(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就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而言,可以得到这样几点启示:

第一,毛泽东思想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毛泽东思想就其与过去斗争情况紧紧相连的一些具体论点、论述而言,已经属于历史;但是,就其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活的灵魂及其基本理论而言,它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有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十四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既不能把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既要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又要看到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毛泽东思想既是理论的,也是方法的。恩格斯在论述马克思的理论时就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 这里讲整个世界观是方法,不仅指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常所讲的辩证法是方法,也包括唯物论是方法;不仅指辩证唯物论是方法,也包括历史唯物论是方法。正是基于这一点,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称之为“伟大的认识工具”^①。就毛泽东而言,他在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把它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②。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不断强调要端正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态度,“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③。他本人还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具体化为正确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方法论系统。因此,毛泽东思想本身也包括理论和方法,其中有的理论本身就是方法。

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方法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按照实际情况来决定工作方针,简单地说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也一直强调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邓小平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还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这就是说,从马克思到邓小平,都强调他们理论的方法意义。毛泽东思想所以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45页。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体实际相结合,是永远常青的科学方法。就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人而言,撇开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不说,在正确思想方面,尽管邓小平与毛泽东对一些问题认识的角度和侧重不尽相同,但就他们要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根本的理论思路和方法原则而言,则不仅是相通的,而且也是一致的;或者说,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毛泽东思想既是有体系的,也是发展的。两个“历史决议”都认定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但是同任何科学理论体系一样,它不是封闭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具有开放性。任何把科学体系同理论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都不符合科学思想发展史的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但它在不断发展之中。毛泽东思想也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在当今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这里所说的发展不是一般渐进式的,而是飞跃性的;既有连续性,也呈现出阶段性,可以说把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然,作为当代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也还要在实践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同样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理论系统。

二、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路程

毛泽东思想以中国大地为故土，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诞生和主要由毛泽东来创立，并不是偶然的。

（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华民族是个具有不平凡性格的伟大民族。它以勤劳刻苦著称于世，有独特的智慧才能，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化；它以勇敢顽强著称于世，有悠久的革命传统，同反动统治者和外来侵略者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创造过无数英雄业绩；它富于政治理论思维，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提出过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在 19 世纪以前，中华民族有过异常辉煌的历史。

到了近代，中华民族落伍了。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晚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使中国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开始被破坏，但封建社会的根基即地主阶级对

农民的剥削，不仅依然保留，而且同买办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支配地位。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很软弱，其大部分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辛亥革命后，封建皇权虽然被推翻了，但代之而起的却是军阀官僚和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还操纵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平衡，并被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分别控制，实际上长期处于不统一状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日益贫困和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人权自由的生活，这种状况在世界上是罕见的。

随着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这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激烈争夺，近代中国成为东方矛盾的焦点，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一起。在这里，国际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华民族之间、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反动统治者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反动军阀与士兵群众之间、反动政府与青年学生之间，种种矛盾都在激化。这些矛盾使中国成为整个帝国主义统治的链条中薄弱的一环。这些矛盾的剧烈运动和撞击，使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不停地进行的革命运动有可能在这个薄弱环节取得突破。

在中国社会的众多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

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既是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其间，经历了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几次大的斗争高潮。先进的中国人，从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到孙中山，为了救亡，为了启蒙，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但都未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① 过去历次斗争的失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一是没有先进的阶级领导革命，一是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革命。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同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他们人数虽然不多，但很集中，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深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具有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他们同广大农民有天然的联系，共同利益使农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3—1514 页。

民能成为他们的强大的同盟军。在历次斗争中起着先锋、桥梁作用的先进知识分子，日益把注意力转向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一旦掌握了这个革命理论，就能成为最有觉悟的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 马克思主义虽在 19 世纪中叶创立，但传到中国却在半个世纪之后。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学说和少量著作的片断逐渐被介绍到中国来，但非常零碎，而且很不准确，甚至多有歪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正确理论。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界的卓越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不断撰文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理论。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马列主义理论的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经典著作陆续翻译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报刊对革命新理论的大力传播，促进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爱国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在传播马列主义过程中，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潮展开论战，阐明中国问题必须求得革命的根本解决，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的需要，社会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这在理论上推动了马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71 页。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研究,在实践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和革命群众运动的结合。

1921年7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出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从此,中国革命运动,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由于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但是,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既不同于俄国,更不同于西欧,在这样一个东方大国进行革命会有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简单地照搬外国经验和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不可能引导革命取得胜利。正如列宁对俄国东部各民族共产党人所指出的:“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①,这种任务的“解决方法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是找不到的”,你们应“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种任务”^②。这些话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根据十月革命后新的时代特点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解决上述困难和特殊任务的过程中创立毛泽东思想的。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第323页。

^② 同上书第37卷第324页。

(二)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创立者的 个人特质

毛泽东能成为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卓越代表,以至于要以他的名字来为这个结合的科学成果命名,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品格、气质、学问、胆识、智慧、才干等等有密切关系。从毛泽东成长的过程来说,他的这几个方面的特质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毛泽东出身农家子弟,与中国农民有天然联系。了解农民,这对于准确地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一个必备的重要条件。

毛泽东祖辈务农,父亲发迹为亦农亦商的富农。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家乡湖南湘潭韶山冲度过的。他在家乡农村生活了17年。作为上过学的有知识的农民子弟,他了解农民疾苦,熟悉农村社会,并开始认真思考农民问题。湖南农村同其他地方一样,农民生活困苦,不断起来进行反抗斗争。在毛泽东家乡附近的湘潭和湘乡地区,就先后爆发过农民的造反运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即毛泽东17岁那年,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波及韶山。这次暴动虽被镇压下去,但使他深受震动。在母亲善良慈爱的品德的熏陶和中国传统美德的教育下,毛泽东自幼就同情贫弱。这件事更驱使他决心要站在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一边,为广大农民谋利益。这对他日后研究中国问题,善于把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有极大影响。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进行

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解决农民问题。诚如他后来所指出的: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①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可谓是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武装农民、解放农民的理论。毛泽东作为农家子弟 17 年和他同农民运动的密切联系这一经历,使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最真切的直接感受,这为他实现理论认识的飞跃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第二,毛泽东对马列理论既学得苦,也学得活,有极高的领悟和把握马列理论精神实质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进行理论创造不可或缺的。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学习马列理论既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多的。但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能刻苦学习理论,不断从中摄取营养,获得理论武装。他是在 1919 年 12 月第二次从长沙到北京以后,参加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才阅读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当时他还没有确定自己在理论上的立场。他同其他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也受到其他种种新思潮的冲击。1920 年 3 月 14 日,他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

^① 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报告。

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① 在当时的许多种主义中,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们较多地拿来作比较和选择的是这五种主义:社会政策,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五种主义中,供选择的不再有原来的资本主义,而都是要替代(至少是矫正)资本主义的。毛泽东正是在对上述种种主义加以了解和比较的基础上,最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个发言和在这同时他写给在巴黎的蔡和森等的信件,标志着他决定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自此以后,他对这个主义就没有动摇过,并且把主要精力用于以这个主义为指针,从事和领导实际的革命斗争。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在井冈山和长征这样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都如饥似渴地找马列书籍来读。他说过,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到延安以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和平环境,学习条件有所改善,他就“发愤读书”,异常刻苦地研读马列理论,特别是有关马列哲学的著作。他写了大量的读书批注,仅现存的延安哲学批注和摘录文字就有两万六千多字。

毛泽东学马列理论最突出的特点是学得刻苦但不死板,没有学理主义、教条主义习气。他在初次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说:“这

^① 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把《共产党宣言》等书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这个提法诚然不够完整准确。但是就阶级斗争是贯穿阶级社会的一根红线,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毛泽东又抓住了认识中国问题的根本;并且他能从中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说明他把书读得极活。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其他人的一个突出品格。

毛泽东善于掌握“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一特质,使他后来在学习和研究马列理论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而是为着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问题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并作科学的理论概括。人们说,列宁的伟大,正在于他没有做马克思主义的俘虏,而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向前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我们不将毛泽东与列宁简单类比,但如果毛泽东不具备这一基本品格,就很难创立毛泽东思想。

第三,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注重社会调查,投身中国革命运动后,一贯重视对中国社会实际状况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这对于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具有决定意义。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已萌生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即向社会学习的思想。1917年暑假,他邀同学“游学”,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2页。

步行千里,考察长沙周围五县的历史地理,了解社会风情民俗,调查农民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这是他生平的第一次调查活动。这次调查活动使他对社会实际问题和国家实际状况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在师范毕业后,他积极组织旅欧勤工俭学,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友,自己却留在国内。他并非不想“出洋”,也有过几年后出国求学的计划,但是,他觉得首先要把自己的国家了解清楚,作为中国人,要在现今的世界上尽点力,不可不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

毛泽东要对这个生于斯、养于斯的中国地盘进行实地调查研究的思想,对他以后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实际的革命斗争以后,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调查研究。从1921年建党到1934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的13年间,在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几乎每年都抽时间或到工人群众,或到农民群众,或到红军战士中间进行调查。他考察过湖南、广东、福建、江西等省几十个县的农村,他的调查对象除工人、农民外,还包括社会其他各色各样人物。他写的调查报告等材料,现在保存下来的有十多种,达二十多万字,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只有毛泽东进行了时间这样长久、次数这样频繁、规模这样宏大、内容这样广泛的社会调查。

调查研究,是理论与实际相通的桥梁,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毛泽东非常注重对中国社会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这一特殊品格,再加上上述其他特质,就决

^①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见《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

定了从主观条件方面说,他成为创立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决不是偶然的。

此外,毛泽东勤学博览,大量汲取中西文化知识,特别是谙熟中国传统文化,这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也是一个有利条件。

毛泽东虽非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他进过私塾,读过洋学堂,既受过六年的国学灌输,又受过七年的西学教育。他酷爱读书,曾到长沙的湖南图书馆自学,“贪婪地读,拚命地读”,看了大量的书,成为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①。在中西文化两大系中,毛泽东既注重西方哲学和社会学说,更熟悉中国先秦的儒、法、道、墨,以及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明清实学的传统文化。从经史子集的典籍文化,到口碑流传的民俗文化,以及植根地方的湖湘文化,他都有独到的了解和研究。在他的世界观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由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以后,他就用新的世界观对传统文化知识实行改造制作,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无疑渊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毛泽东在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也批判地汲取和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从而使其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文化来源。毛泽东早年的文化积累及以后对它的选择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点。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120页。

(三)毛泽东思想形成以前中国共产党人 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积极地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斗争中。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首先领导了一系列的罢工运动。从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工人大罢工到1923年“二七”京汉铁路员工大罢工，从1925年的上海“五卅”运动到发生在广州、香港的省港大罢工，不仅表现了愈益觉醒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影响。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辈子却屡遭失败的孙中山，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希望，热诚地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实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参与下，在广州的革命政府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举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南方各省工农群众运动迅猛发展。但是还在孙中山逝世不久的时候，国民党右派势力就开始猖獗起来。当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并准备继续北上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把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工农革命群众投入血泊之中。这样，1924年至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而且从党成立之日起就在不断地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制定中国革命的基本纲领、路线和策略。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认识

难免是不确切、不深刻的，甚至还包含有某些缺陷和错误，但它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逐渐有了基本正确的初步看法。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还不是在党中央居重要领导地位的人物，但作为党的一名重要干部，他不但组织和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以及国民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而且从理论上思索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1.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

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对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认识的基础，也是对中国革命其他问题的认识的起点。如果说中共一大的历史任务是确定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按照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原则来制定党纲，还没有提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实际这样的问题的话，那末自1922年初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在参加列宁指导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有了初步的思考。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夕的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发表的对时局的主张，即指出中国是一个在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官僚压迫下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中共二大分析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认为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在封建制度把持之下“中国方兴的资产阶级的发达遭着非常的阻碍”。中共二大宣言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①这样，中共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6页。

二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把上个世纪早已开始长时间里没有完全弄清的革命的性质和对象问题,从大体的轮廓上基本解决了。

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性质继续进行研究。1923年4月,陈独秀撰文提出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概念,认为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的两重意义”,“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这是半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有性质”^①。中共三大为了把中国的民主革命与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加以区别,正式把中国民主革命称为“国民革命”,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②。毛泽东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与党中央的认识是同步的,认为:“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政治压迫”,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是“用国民的力量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③。

中共二大在确定中国民主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同时,在理论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吸收会议前夕的一些认识成果,初步地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为两个阶段的思想。中共二大宣言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

①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期。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5页。

③ 《北京政变与商人》,1923年7月11日《向导》第31—32期合刊。

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①对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这个分析,不仅是制定中国革命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根据,而且为后来形成的革命转变理论作了一定的准备。

2. 关于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中国革命既然分为两步走,那么作为第一步的“国民革命”由谁来领导呢?中共二大虽然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有伟大的势力,“发展无已的结果,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②,但是无论中共二大还是中共三大,由于受到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即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截然分开,看不到无产阶级可以领导民主革命以实现前者同后者的联系和转变)的影响,还把民主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无产阶级只起“帮助”、“促进”和“督促”的作用,不懂得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掌握领导权的意义。在中共党内,较早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的,是高君宇、瞿秋白等。高君宇在1922年的《向导》第4期上著文说:“在国民革命当中,无产阶级是要站个主要的地位,资产阶级是被召集而参加的。”瞿秋白在1923年6月提出,“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③;在1923年9月进一步指出,要“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77页。

② 同上书第1册第76页。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90页。

以至于指导权”^①。邓中夏通过对工人运动的实践总结,也较早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他在1923年12月的《论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②1924年11月,他在《我们的力量》中明确地写道:“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③“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作国民革命的领袖。”^④但是,瞿秋白、邓中夏在发表这些好的思想的同时,有些分析又含有“一次革命论”(即看不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以为可以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毕两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左”的思想倾向。

从全党来说,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初步形成共识始于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中共四大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既是“资产阶级性的德谟克拉西(民主)革命”,又“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无产阶级“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⑤。中共四大以后,工人运动有了较大发展。五卅运动不但以实际斗争说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而且证明了无产阶级有能力实现这个领导。邓中夏、瞿秋白继续撰文,进一步阐发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21页。

② 《邓中夏文集》第42页。

③ 同上书第101页。

④ 同上书第102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77—278、272—274页。

但是,中共四大及其以后,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没有作出具体切实的回答。这一弱点在随后的大革命运动中渐渐地暴露出来。

3. 关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中共二大首次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其中指出:中国的广大农民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小资产阶级的大量群众因遭受极大痛苦,会“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面来”,因而也是国民革命的动力。在中共三大前后,陈独秀虽然否认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却对中国农村社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中共四大首次提出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并且“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

随着准备和迎接北伐战争,工农革命运动愈益高涨,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有了巨大进步。1925年10月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出“耕地农有”问题。1926年2月,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不掌握在最受剥削和压迫的贫农和佃户手里,“‘耕地农有’便成了广大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①,国民革命要“使耕地尽归农民”;党加强农民运动,“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组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②。

^① 《李大钊选集》第532页。

^② 同上书第534页。

同年5月,有南方11省代表参加的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对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有了进一步认识。大会指出:“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也就是在解放这大多数农民的痛苦”,“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便是一个农民革命,换句话讲,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在经济的观点上和群众的观点上,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是占一个最主要的地位,农民运动问题是国民革命运动中的根本问题”^①。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主要从事农民运动和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他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12月)、《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1926年9月)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等著述,以大量实际材料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诬蔑,批评了党内出现的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运动领导的错误倾向,并以异常鲜明的态度论述了无产阶级对正在蓬勃高涨的农民革命运动大力支持和加强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些著述里,毛泽东的许多分析丰富了党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他的理论特色在于,不是一般地强调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而是具体分析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从中国社会的总体阶级关系上考察农村各阶级状况,论述了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他也不是笼统地把不同阶层的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而是在具体分析各阶层农

^① 《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关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地位决议案》。

民的不同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之后,提出无产阶级应当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为基础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他也不是抽象地说明农民革命斗争的重大作用,而是着重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重大意义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从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的领导权思想。这些认识说明在农民问题理论上,毛泽东已站在全党的最前列,堪称毛泽东思想的最初萌芽。

4. 关于资产阶级和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较大变化。中共一大按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性原理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要“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中共一大之后,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论,端正了对中国革命任务、对象的认识。1922年1月召开远东民族大会,列宁接见中国代表团,关注国共两党能否合作问题。这次大会提出了建立“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个概念。在1922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时局的主张中,肯定中国实业家也受外资和官僚压迫,不再一般地视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中共二大进一步肯定中国资产阶级能够参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卖国政府”的斗争;为了“打倒列强,除军阀”,提出组织包括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并决定了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的意向。

中共二大以后,陈独秀、瞿秋白等对中国资产阶级进行了理论研究。陈独秀先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将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部分;后又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将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

阶级”和“商业工业资产阶级”两部分。瞿秋白也撰文把中国资本主义划分为“买办式商业资本主义”和“官僚式财政资本主义”同“真正的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两部分，认为前者产生“官僚资产阶级”，后者产生“商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是“军阀制度的政治及帝国主义的经济之副产品”，“当然成为卖国派、专制派”；商人阶级既受外国“挤轧”，又受军阀的“勒索压迫”，“当然成为爱国派、民治派”^①。这些是我们党对资产阶级两部分最早的分析，不仅为在实践中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提供了指导，而且为后来发展和完善这个理论进行了前期工作。瞿秋白还是中共党内最早使用“统一战线”这个概念的领导人。这些都为中共三大决定实行与国民党合作、建立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作了理论准备。

中共四大在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的同时，鉴于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分化对国共合作关系造成的复杂局面，初步制定了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和反对右派的统一战线策略；在理论认识上明确地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大商买办阶级”（或称“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新兴工业资产阶级”（或称“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两个部分，认为前者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反革命派”，属于革命对象（这是正确的）；认为后者还未形成独立的阶级，“还不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这是不正确的）。这说明当时对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定见。五卅运动比较明显地展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最初积极参加后又妥协动摇），这为共产党人较为深入地剖析这个阶级的特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3页。

性提供了客观条件。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不仅揭示了民族资产阶级既需要革命又害怕革命，对革命持有动摇不定的“矛盾的态度”；而且进一步将民族资产阶级分为左翼（“纯民族资产阶级”）与右翼（“半民族资产阶级”），指出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①。这个分析高出于当时的一般认识水平，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实际状况，为党制定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于1925年11月21日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写道：“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实行中国国民党之三民主义，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地主阶级（即与帝国主义、军阀有密切关系之中国大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右翼），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可以说，这是对当时党的总路线的一个简明清晰的表达，成为后来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前身。

5. 关于武装斗争和政权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校长时间内批评国民党专做军事工作而忽视群众运动，自己却走到另一个极端，集中力量专做工农运动而忽视军事工作。瞿秋白曾经指出，那时对“无产阶级领导权”涵义的理解，“仅仅指群众运动中的领导权，至于政权与军权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页。

在无产领导以外的”^①。在大革命深入展开后，中国共产党人对武装斗争和政权问题才逐渐有所认识。

周恩来是党内最早从事实际的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1925年6月，他在随黄埔军东征回师的讲演中说：被压迫阶级应该利用军队“这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他积累了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初步经验。1925年9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提出要“有组织的去预备武装工人阶级中最勇敢忠实的分子”^②，并决定在中央设立军事委员会。同年11月，周恩来负责组建了由叶挺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革命武装。湖南农民运动兴起后，毛泽东提出了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打倒农村地主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等思想。在理论上，瞿秋白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国民革命里极端需要革命的正式军队”^③，“现在无产阶级应当参加革命的政权，应当指导革命中的武力”^④。邓中夏对取得政权问题作了更多的论述。他写道：“我们对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⑤但是“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⑥。还指出：“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只有无产阶级参加政权，才能“防范资产阶级在革

① 《瞿秋白选集》第364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04页。

③ 《瞿秋白选集》第284页。

④ 同上书第364页。

⑤ 《邓中夏文集》第130页。

⑥ 同上书第129页。

命中之妥协软化,并制止其在革命后之政权独揽”,给将来建立工人政府“预为准备”^①。

从全党来说,在大革命失败之前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从中国共产党方面说,无疑与理论上对武装斗争和政权问题缺乏足够认识有密切关系。通过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的重新崛起和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也首先是从这个问题突破的。这是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6. 关于党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尽管没有制定党章,但中共一大的党纲包括了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规定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活动和党员身份应当保守秘密。中共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强调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内必须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高度的思想觉悟,“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②。中共三大决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但由于是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去实现,因此,在组织方面,中共三大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

中国共产党创立后,由于它的领导人和活动家都匆忙地投

① 《邓中夏文集》第129—130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8页。

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忙于应付复杂多变的政治斗争，因此在当时来不及也不可能对党的自身建设作出更多的理论思考。

总起来说，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次预演。同时，这次大革命（包括大革命之前的工人运动），也使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并且积累了一定的成果。毛泽东在这些成果的取得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诞生，是以这些成果作为准备的。

（四）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 艰难困苦中创立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创立以来从未有过的艰难岁月。

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全部转入秘密的地下状态，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急剧减少到一万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大部遭到失败。就城市言，1927年8月的南昌起义和12月的广州起义，都遭到强大的反革命力量的进攻，没能站住脚。就农村言，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在十几个省发动了一百多次起义，大部分被镇压下去。坚持下来的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受到反动派的“围剿”，因而长期处在反“围剿”的战争状态。

党中央领导机关在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非常时期，对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斗争策略往往缺乏冷静和实际的正确把握。在大革命后期犯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

误，土地革命开展后又犯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特别是从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在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不但使一度好转的形势受到摧残，而且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分析中国国情和阶级斗争形势，制定战胜敌人的战略策略，终于在实践上开始探索出了一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道路；在理论上逐渐创立起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

八一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新篇章。

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确定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接着在8月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为了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而“上山”的意见。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到湖南去领导秋收起义。当起义部队攻取长沙的计划受挫后，他及时地率部“上山”，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工农武装较易立足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进军。10月下旬，部队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随后，在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等地也纷纷建立

起农村革命根据地。

正当毛泽东等在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之时，党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损失。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六大正确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指出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现时的革命处于低潮形势，“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六大还提出了继续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六大的这些结论，使党内十分混乱的思想大体得到了统一，党的工作有了重要转变。从总的方面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也有缺点，主要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把背叛了大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视为革命的敌人，对中间派的作用和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分析。

六大的正确认识为毛泽东所接受，它的不足由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逐渐地解决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从事创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发展了六大的路线和思想。

在六大召开之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已达七、八个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之后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也有两个多月。井冈山会师不仅使革命

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两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而且装备和训练得到了较大改善,增强了战斗力,对于打退反动派的“进剿”,坚持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都具有重大意义。

应当承认,在1927年10月到1928年上半年,党中央在主导方面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同时,在所发出的总结各地斗争经验,指导各地工作的一些指示、决议和通告中,也提出过“发展游击战争”、造成“割据局面”、“创立革命区域”、实行“农民割据”和“工农割据”等主张。但是比较系统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既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具体办法和政策,又在理论上加以概括和阐发的,是毛泽东。他根据在井冈山地区一年来的实践经验,在1928年10月为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和11月为井冈山前委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深刻地分析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形势下,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第一次使用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主要有五点:第一,是中国作为“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国家的特殊国情,“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的连绵不断的战争。各个白色政权间的分裂和战争,使其反动统治出现不少缝隙和薄弱点,这就给红色政权的发生和坚持下来以可乘之机。“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

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① 第二,是1926年和1927年大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运动曾经高涨的湘、赣、粤、鄂等省。在这些地区,党在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机构都有较大的发展。这是红色政权得以存在和坚持的群众基础。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反革命势力将人民大革命镇压下去了,但现时中国的各种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会继续尖锐化。这样,反动统治者间的分裂和战争将继续下去,“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②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即军事力量基础。毛泽东说:“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③ 正是在论述这个“必须充分具备的”重要条件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犯错误,是“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的另“一个要紧的条件”^④。五十天后,毛泽东在向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对“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又作了补充,他除了论列以上主要条件外,还提出:一是“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二是“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在该报告中,他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诸要素——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和割据地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5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问题等，从而初步地形成了所谓“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三位一体的总概念。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革命形势在向前发展。1929年初，在全国十几个省三百多个县中已建立有十几块农村根据地，扩大了工农武装割据局面。这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深入考虑红色政权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前途问题。同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开辟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井冈山道路，指出：“这条道路的正确，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①1930年1月，毛泽东为批评以红四军重要领导干部林彪为代表的对时局的悲观估计，在给他的一封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入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揭示了受到帝国主义欺侮的中国社会内外诸多矛盾发展的极端尖锐性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大趋势，阐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国家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丰富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指出：建立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实行武装与群众相结合，深入土地革命，扩大武装采取逐步升级办法，波浪式地扩大政权，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②。这封信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概念，但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实际上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观念,并且把小块红色政权的发展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从而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的一个飞跃。这以后,他始终坚持这个思想,并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实现了对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理论总结。

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初步形成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揭示出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最重要成果,因而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创立的最根本标志。围绕着中国革命道路思想的形成,毛泽东的一些与之相关的重要思想也逐步展开了,其中包括土地革命的思想,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

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中共五大讨论过土地问题,开始把土地革命提上议事日程,但在当时复杂危急的形势下,既没有明确的决策,也没有组织实行。八七会议虽然鲜明地提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但是还没有也不可能周密地解决土地没收对象和土地所有权问题。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思想最初也并不十分明确。到井冈山后,特别是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创立以后,通过不断地调查研究和实践摸索,排除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左”的干扰,才基本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解决了土地没收对象、土地分配原则和方法、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和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等重大问题。他在1932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于农村的各个阶级、阶层划分的标准作了明确

的政策规定,是进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指导文件。经过对前后六七年经验的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一条基本适合中国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将无偿没收的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所有。这条路线促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工农武装割据要以根据地为依托。把农村作为革命力量生存和发展的基地,必须搞好根据地建设。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毛泽东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一方面强调要利用革命武力和革命法庭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形成自己的专政;另方面也十分强调民主政治建设,致力于密切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他认为苏维埃政权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要真心实意地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既充分认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又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认为根据地经济建设,一是保证革命战争的供给,二是改善人民生活;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发展力量弱小的国营经济(1931年11月已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生产,而发展农业生产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又是第一位。在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关于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思想。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伊始,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红军的建设工作。一是大

革命失败后党内军内思想较为混乱；二是农村生活异常艰苦，基本温饱得不到保障；三是党和红军的基本成份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党和军队的素质。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①。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决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一部分）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党的建设方面，毛泽东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党，强调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认为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开展党内批评和提倡调查研究是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方法。在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时，就已着手建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上井冈山后，逐步明确了军队的任务，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和党代表制度，提倡改善官兵关系的军内民主主义，制定处理军民关系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进一步论述了人民军队的宗旨和任务，规定了正确处理军队内外上下关系的基本原则；经过几年的战争实践，毛泽东还初步地总结出开展游击战争和进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这样，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思想初具雏型。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之所以能够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较为科学的总结，提出符合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国实际的正确理论观点，与他就那时基本形成了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且在党的领导干部中致力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有密切关系。1930年1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集中反映了他的这种努力。他尖锐地批评了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唯上”、“唯书”，照抄决议本本、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①等重要思想。这样，毛泽东不仅在实际运用上而且在理论指导上，初步解决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反对本本主义》表明毛泽东已形成独特的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思想路线。它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是标志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五）延安时期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一隅站稳脚跟，开创新局，聚集力量，总结经验，准备胜利的时期，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和多方面展开并取得全党共识的时期。毛泽东思想能够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和展开并取得全党共识，主要原因和基础是：

第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为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和发挥作用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115、116页。

义会议前，毛泽东不在党中央负主要责任。他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路线和策略，先是遭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后又遭到一次又一次“左”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排斥和打击。“左”倾教条主义导致中国革命又一次失败，红军被迫放弃艰辛缔造的革命根据地，实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改组了党中央，在毛泽东领导下，党和红军摆脱了频临的绝境，逐步转危为安。到陕北后，逐渐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毛泽东作为全党全军领袖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这使他更能总揽全局，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系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开展革命理论的研究。对全党来说，不仅中央领导层，而且越来越多的高级干部，都学着运用毛泽东的思想方法，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对毛泽东思想集中全党智慧，发展到成熟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历史、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有了更为深刻和完整的认识。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中间经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很大胜利，打退了蒋介石的四次“围剿”，后来又遭到挫折。这两次胜利，两次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从比较中对中国革命的规律作深入的思考。毛泽东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

件,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到陕北后不久,毛泽东就着手总结历史经验。1938年10月,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建国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以比较完备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②这个根本原则。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实践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生动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经过历史反思达到成熟的实践基础。

第三,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现实土壤。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不单是对以往历史经验的反思,也是对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现实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中国社会本来存在的重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激烈和尖锐。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的矛盾;另一方面,国内各阶级、阶层、政治集团和政治派别之间的矛盾在这期间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开。就国民党来说,它既与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利益冲突,因而有抗日的一面;同时又与日本帝国主义有反共的共同利益,因而又有对日妥协投降的一面,它的一部分军队和官吏甚至公开投降,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成立傀儡政权。就共产党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82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1页。

来说,尽管与国民党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实际上肩负着两面斗争的任务。一方面,大敌当前,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它的主要力量放在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军上;另一方面,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武装冲突,甚至挑起的局部战争,又不能不进行反击,同时还要使抵御内阋之争不影响抗击外侮之敌。就国共之间的政治力量来说,在日寇入侵和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各种各样的中间政治势力,从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到各种地方实力派和各种倾向的小党派,空前活跃起来,出现许多新的动向和组合。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入侵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发生矛盾,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和矛盾也在激烈展开。尽管中华民族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也有矛盾,但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又有可能也有必要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的苏联支持中国抗日,又一度与德、日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当它与英美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时,又主要采取支持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历史的异常特殊性和矛盾的异常复杂性都是前所未有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深远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正确地处理了这些矛盾,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经验。“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①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是总结这些宝贵经验的必然结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7—158页。

第四,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推进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成熟,建立起独特的理论体系并取得全党的共识,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的宗旨是反对对党发生过重大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教育干部,使全党在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在毛泽东倡导下,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改变了学风,克服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加强调查研究,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此基础上,全党高中级干部又通过学习和讨论党的历史路线,明辨了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基本是非,加深了对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掀起了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就是这时提出来的。

延安时期(这里说的延安时期,实际上是把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进入延安以前的一年多时间包括在内的)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展开,主要表现为以下诸多方面:

1. 建立起了哲学理论。

毛泽东的哲学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以来撰写的政治论著即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他的许多独特分析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体现了从哲学的高度(克服主观主义,洗刷唯心精神,注意社会调查)来解决形势分析和工作指导问题的思路。《反对本本主义》更是一篇

振聋发聩的哲学宣言,堪称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到陕北以后,1935年12月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虽然是政治理论著作,但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光芒。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军事理论著作,更是如此。毛泽东通过对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初步地阐发了他的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以这两篇著作作为前导,1937年7、8月在延安写的《实践论》、《矛盾论》实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飞跃。“两论”既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又是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总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必然升华。对毛泽东来说,“两论”实现了由萌生有特色的哲学思想到建构有特色的哲学体系的飞跃和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飞跃。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思想方法论问题的着重提出和群众路线的认识论的深刻阐明等等,使毛泽东思想的哲学理论更具特色。

2. 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

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枪杆子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进行土地革命,并以革命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进攻,通过战争学习战争,形成了红军开展游击战和游击性的运动战的独特的战略战术原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的长征,使党的领导人不能不对军事战略战术上的争论和得失进行深入的思索。遵义会议首先是纠正“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在军事战略战术上的错

误，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和主要依据这个发言写成的遵义会议决议体现了这种思索的成果。到陕北以后，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名军事著作。在抗日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又先后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重要著述。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系统地总结了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地论述了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把战略上的劣势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深刻地说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开展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和人民战争思想，预测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并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以及相持阶段敌我斗争的形势，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阐述了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原则。这三篇军事著作，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最光辉的军事理论著作，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军事理论已经成熟。

3. 发展了统一战线理论。

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从党的发展史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实践虽然先于武装斗争的思想和实践，但是这两个思想理论的成熟却都在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的成熟，一是由于抗日战争开始以前，提出和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二是由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统一战线内部进行各种复杂斗争的实践。1939年至1941年，是中国抗战史上各方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统一战线内外形势变得

最为扑朔迷离的特殊岁月，毛泽东在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同时，领导全党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这些斗争在政治上挽救了岌岌可危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毛泽东在指导和总结这些斗争中写出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1941年5月8日）等著作，对抗战新形势下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态势和变化的精邃分析，对争取中间势力的一整套政策的精辟论述和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指导，在理论上丰富、充实和逐渐地完善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自此以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基本定型。

4. 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如前所述，党的早期领导人已经初步地提出了若干实际上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时，进一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作了准备。到抗日战争时期，在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经验，以及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先后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4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明确地创造性地阐释了“新民主主义”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和前途等根本问题进行了精辟分析，基本完成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化的工作,从而正式宣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进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已经创立起来。

5. 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大本营。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深入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相继建立了十多个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进行了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在内的全面斗争,积累了异常丰富的根据地建设经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述中不仅总结了这些新鲜的、生动的实践经验,而且作了理论的升华和阐述,概括出了既区别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又区别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初步制定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各抗日根据地所进行的许多工作,实际上就是在局部范围内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这些著述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既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又为后来全国范围内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6. 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

抗日战争开创了党的事业的新局面,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以肩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毛泽东适时地把握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向全党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文章回

顾了18年来党的建设走过的历史道路,强调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必须紧紧地围绕着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提出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一起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整风运动实际上是全党范围内的深刻的整党运动。毛泽东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创造了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一系列好方法,为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无产阶级化的党积累了宝贵经验。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党的其他整风文献,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在中共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建设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和多方面展开,上述几个方面的理论的成熟性,是毛泽东思想整体理论成熟性的具体体现。

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心悦诚服,对毛泽东思想的独特创造敬佩有加。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①这个评论反映了全党的共识。

有了整风运动和“历史决议”的思想基础,到了中共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刘少奇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8—999页。

了说明这个问题的必要性,进一步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① 因此,它“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② 这里讲的“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中共七大一致通过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从此,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便通过党的根本大法形式正式确定下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六)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共七大以后不久,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和平、民主、建国的新阶段未能到来,解放战争在1946年6月爆发。延安时期的下限,应该定在中共七大和抗战胜利,还是定在解放战争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② 同上书上卷第334页。

爆发和党中央撤离延安,这里不作讨论。从抗战胜利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这一段时间有整整二十一年。其间的前十二年(即到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前),中国人民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并且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毛泽东思想在高歌胜利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黄金年代。后九年(即从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左”的错误逐渐滋长,使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受到干扰,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挫折。但是,在纠正错误和调整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取得进展,毛泽东思想也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添了新的内容。

这里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分期与对党的历史发展的分期不完全一致。党史分期主要根据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毛泽东思想史的分期在毛泽东健在时主要考虑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两者一般是吻合的,也有发生交错的地方。这里的前十二年包括建国前后两段历史。就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来说,当然可以再分为两段。不过后一段的下限不能像一般党史分期那样设在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而要划到1957年夏天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前。这是因为在中共八大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思想还在继续向前发展。中共八大以前的《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以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到最佳状态的代表作。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左”的错误抬头的一个转折点。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1957年后,‘左’的思

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①因此叙述毛泽东思想发展历史时应该把这个转折作为划分时期的一个界线。

下面，我们分四个小阶段来进行介绍和评述，即：甲、解放战争时期；乙、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夏季；这两段合起来是前十二年。丙、后九年的曲折；丁、“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

（甲）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胜利后，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拒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建国的一切要求，妄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他们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已进入了武装的革命和武装的反革命开展大决战的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光明的中国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的中国之间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斗争，是这个时期的历史主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依靠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夺取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毛泽东思想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

1. 提出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略思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就在于自恃外有挟原子弹以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财政上的巨大援助，接受了侵华日军百万人的全部装备；内控全国

^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02页。

各大城市和四分之三以上地区与人口，扩军到四百多万，并利用和谈之机完成了进攻的准备。而当时我方力量相对弱小，人民军队只有百余万，且装备甚差；解放区面积和人口不到全国的四分之一。因此，反动派发动战争之初，气势汹汹，扬言只需三五个月即可结束战争。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这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个严峻考验。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①基于这个认识，毛泽东还论述了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对于指导革命战争和其他革命工作都具有方法论意义。

2. 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新发展。

解放战争是一部威武雄壮的战争史诗。原来估计五年左右或者五年到十年可以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结果战争的发展比预料的顺利，仅用三年多时间即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②。特别是从1948年秋开始先后开展的三大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把这部战争史诗的磅礴气势推向了最高潮，不仅在中国战争史上罕有，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不多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为组织和指挥好各个战役，在《集中优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② 《毛泽东转战陕北》第367页。

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的总结》和《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等著作以及其他大量文电中提出的一系列战略原则,使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基础上形成的军事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如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内线歼敌,以大规模的歼灭战打破敌人的全面进攻,诱敌深入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采取跃进方式展开战略进攻,实行有利的战略决战歼灭敌军重兵集团,实施战略追击消灭残余敌军等思想,都是新经验的结晶。至于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概括的“十大军事原则”,更是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3. 发展了革命转变的理论。

由于解放战争的发展进程和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比预期的要快、要大,实行革命转变的问题即将由理论的预见变成面前的议程,因而在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就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新的深层次的思考。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探讨了革命转变问题,发展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毛泽东指出:革命转变首先是由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同时也是由革命向建设的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也包括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而归根结底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并且阐述了实现这个转变的基本政策。这些思想使革命转变理论的内容得到了新的发展和多方面展开。

4. 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在全国胜利前夕,在思考如何实现革命转变时,建立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政权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已经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初步思想。在1948年6月1日中宣部写的《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已使用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在1948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革命转变的形势的同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主张。随后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特别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文章中，全面地深刻地阐述了即将建立的国家政权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以及对人民的民主方面和对敌人的专政方面的关系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任务，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为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诸多方面，在解放战争时期都充实了新的内容，如：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同反帝反封建一起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对象，既反映了官僚资本主义随着国民党统治而迅速膨胀的新情况，又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进一步联系起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从总结解放区大规模土地改革的经验中丰富和发展了土地革命的理论，等等。以上四点，只是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几个新的要点。

（乙）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夏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此，我国进入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和逐步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建国之初，毛泽东保持了“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①的精神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页。

状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领导全党努力学习原来不懂的东西,踏踏实实地建设新国家。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要求全党仍然要抓住肃清国民党残余和推翻地主阶级这一主要任务(主要矛盾),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方面的关系,不要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这样,仅用短短三年就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稳定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实现了各民族的空前团结。此后,一方面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一方面进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出现“左”的急躁冒进情绪,使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发生了若干偏差,但总的来说,整个国家朝气蓬勃,欣欣向荣。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1956年中共八大对中共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的成就作出了科学总结,并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向前推进了中共八大的方针。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个盛世年代。在这个盛世中,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以下这些方面:

1. 关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统一战线的扩大和统一战线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式、内容和任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宗旨是要实现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最大范围的团结。建国前夕酝酿成立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体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一宗旨的最好的组织

形式。它既不同于一般的人民团体,除了一开始曾经“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①以外,也不是权力机关。它采取政治协商的议事原则,是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意见的特殊渠道,“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影响,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创造。通过政协形成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是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创造。党和政府制定的在统一的国家内部实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而不是实行各民族共和国联邦的政策,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要创造。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思想。

2. 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思想。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掠夺和压榨,加上连续几十年的战乱破坏,新中国在经济上接收的是一个落后畸形、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民生困苦,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面对这种严重困难,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彻底铲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同时,把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工作的中心,特别是努力抓好农业、交通和工商业的恢复,积极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对待工商业的正确政策。党中央还花很大力量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艰巨斗争,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局面,稳定了市场,安定了人民生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690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68 页。

活，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得到了基本好转。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的著述总结了这方面的丰富经验，发展了党的经济思想。

3.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

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即将开始的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形成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以前，在讲到将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党的领导人通常都是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建设，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采取“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一步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改变了原来设想的“将来一举转变论”，形成了“从现在起逐步过渡论”。这是实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又一个理论构想。如果后来的实践严格遵照原定的规划，以渐进方式用十五年左右时间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那么改行这个构想也可能不失为好的选择。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思想丰富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理论。

4.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头两年，改造工作比较平稳。到1955年夏季，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在党内发生了争论。毛泽东把这种工作中正常的争论看得异常严重，提到方向、路线的高度，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著名报告。这个报告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和基本指导方针的许多论述还是

正确的,对我国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关系的分析等等也包含深刻见解。但是,报告的主旨是反“右倾”,而这个主旨是建立在对农村形势的不正确分析和对争论性质的不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的。开展反“右倾”之后,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政治压力下形成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原来预计(《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也仍然认为)从总路线公布算起要用十五年时间来完成农业合作化,结果仅用三年时间(也就是反“右倾”后仅用一年时间)就急促地完成了。在它的推动下,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任务也过于急促地完成了。尽管有后期发展的这些失误,但是从方向上说,三大改造的提出是符合当时的客观需要的,在改造进程中创造的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是有一定的中国特色的。

5.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全党既缺乏足够的理论准备,也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某种程度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最初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苏联经验并不都是成功的,苏联成功的经验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情况,学习苏联经验终究不能代替对自己道路的寻求。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开始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探索。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标志着这一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中共八大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在中共八大以后,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部光辉著作中,不仅在继续进行探索,而且对某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中共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极富有创

造性，也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无论在工业化道路、经济建设方针、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还是民主政治建设、科学文化工作方针等方面所提出的思想，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这些探索成果，认为这是开始提出了自己的建设路线。

6.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

这是中共八大前后探索成果中最重大的成果，也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思想发展的最重大的收获。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解决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没有完全解决的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矛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有没有不同性质，要不要加以区分等重大问题；也初步提出了在国内由于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显现和突出以后，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政策。

7. 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早在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十分强调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在一部分人中滋长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和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的腐化现象，从1951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党组织内分期分批进行整党。而以反贪污为中心的“三反”运动，其实正是一场切实的、严厉的、收到很大成效的整党运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总结和分析了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和问题，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和任务。从中共八大开始酝酿到1957年5月1日发出指示的全党整风，以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在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已经建立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部署。

（丙）后九年的曲折。

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是“左”倾指导思想的第一次严重的抬头；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的“左”倾错误作了初步纠正。这是这个阶段历史发展的第一次曲折。

1957年春天的全党整风，很快转变为反右派运动。对极少数趁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击，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反右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个错误使刚刚有了良好开端的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被扭转了方向。原来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思路，被抛开或者改变了。“左”的思想发展起来，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

一个是阶级斗争问题。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使党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发生偏差。中共八大曾经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矛盾，从而要求全党把工作中心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反右以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随后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否定了这一基本正确的论断，重新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是对已经发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说明，而且成为以后一再出现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

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问题。反右扩大化影响到经济建设，成为进一步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的重要动因。1956年上半年，一些同志针对伴随社会主义改造急剧加速而出现的经济建设中的盲目冒进现象，提出了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的口号。毛泽东对于提出反冒进本来就持保留态度。在中共八大期间，他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同意在经济建设上采取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但是反右以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反复。他在1957年10月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严厉批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等口号，给右派分子提供了口实，是“右倾”、“促退”。随后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继续对反冒进进行了尖锐批评，认为反冒进离右派只剩下五十米，是少、慢、差、费，与反冒进的斗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种路线的斗争。这样的批评不仅否定了过去的正确决策，而且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助长了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在这样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下，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虽有反映人民群众希望尽快改变经济落后状况的一面，却不能不带有过份强调主观意志而忽视客观规律的浓重色调。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钢铁生产当年翻番的决定和普遍建立“一大二公”的农村人民公社的决定，甚至宣称：“共产主义在我国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盲目冒进的建设速度和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改造方案相结合，使整个国家一时处于狂热之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严重泛滥，经济工作完全乱了套。从毛泽东的主观愿望说，他发动“大跃进”，号召建立人民公社，无疑是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

路上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这个探索，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它不符合中国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状况和需要，给生产力带来很大破坏。这是建国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在全局上的一次严重失误。

到1958年秋冬之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许多问题。毛泽东既是这个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发现问题并带领全党努力去加以解决的领导人。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的八、九个月内，中央领导全党为纠正当时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作了许多工作。这种努力在端正指导思想方面虽然还很很不彻底，但毕竟遏止了错误发展的势头，而且在初步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要继续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按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搞好综合平衡等不少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

庐山会议后期发动的反右倾和随后的继续“大跃进”，是“左”倾指导思想的第二次严重的抬头；1960年冬开始的调整政策和总结经验，对这些“左”倾错误再次作了一定程度的纠正。这是这个阶段历史发展的又一次曲折。

庐山会议原定的主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左”。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陈述己见，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认为就主观方面而言，“犯了不实事求是的毛病”，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等等。彭德怀的信和支持彭的观点的张闻天等人在会上的发言，引起毛泽东强烈不满。毛泽

东认为当时的“左”只是工作中的问题，不是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庐山会议以前的纠“左”，尽管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正是在坚持“三面红旗”“伟大”、“正确”的前提下进行的，并认为如果否定“三面红旗”，那就是“算帐派”，甚至是敌对分子。彭德怀的信，被毛泽东看作不是对工作中缺点、错误的批评，而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并且是配合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向党猖狂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他决心发起反击。这样，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就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倾，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接着在全国范围内错误地开展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次反右倾斗争带来的后果，一是把反右派斗争以后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规律的“左”的理论，进一步扩大到党内，严重损害了党内同志关系和民主生活；一是在经济工作中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正在纠正的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的时间更长，造成的危害更大。这就是随之而来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中国人民遭到一场严重的灾难。

受到这种“惩罚”，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决心加强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还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间，毛泽东、刘少奇等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理论反思，其中虽然有不少“左”的观点，但也提出了不少好的思想。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即在党内印发了新发现的毛

泽东旧作《关于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会后,党中央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毛泽东在对农业情况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并几次修正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在这个条例的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由党中央主持,分别制定了“科研十四条”、“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和“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在当时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相关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党在这些方面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为国家形势的好转奠定了重要基础。1962年1月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是全党七千名各级负责干部在一起全面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大会。毛泽东讲话,强调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对那几年中央在工作指导上的失误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1962年10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是“左”倾指导思想第三次严重的抬头。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将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但是无论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和经济政策的调整,还是对政治关系的调整(为大批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的同志甄别平反),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层中实际上都存在不同看法。特别是对农村政策调整中包产到户之类的试验相当广泛地推开,在中央领导层有明显的意见分歧,矛盾逐步表面化。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把他所不同意而实际上是比较符合客观情况的一些意见,看成是右倾机会主义

即修正主义的表现,并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再度被视为阶级斗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和会后,毛泽东进一步作出理论概括,实际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因而要把“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这就把在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了,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党的工作出现二重化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毛泽东的注意力再度转入抓阶级斗争,发动了“四清”、“五反”、“反修防修”和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错误的和过火的批判,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逐步升级;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吸取了庐山会议的教训,表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这样,经济上的调整继续按原定计划进行,到1965年完成了原定的任务。在此期间,毛泽东一方面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发展了“左”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富有远见的思想观点,如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分“两步走”,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等等;还写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言简意赅的哲学著作。

综观九年的曲折反复,不难看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指导思想存在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即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

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调整政策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即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前者属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后者属于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偏离。毛泽东自己在若干方面偏离了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如同对正确的东西还要作分析一样,对错误的东西也要作分析。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带来了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它们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无论就毛泽东个人还是全党而言,有时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占上风,有时则是错误的趋向占主导,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这种曲折交错的情况决定了对这段时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行研究的异常复杂性。

（丁）“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破坏。

从1966年6月到1976年9月，是毛泽东的最后十年，也是他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悲剧的十年。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①人们把它称为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形态，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指导，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认为党内从中央到地方有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搞“大民主”，“踢开党委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这就把从“反右倾”到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乃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错误，发展到在性质上和规模上都严重得多的地步，时间持续也长久得多。“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②人们现在把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称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而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毛泽东思想恣意歪曲、肢解和篡改，并且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推到极端，把它称颂为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和最高成果。这无论对全党还是对毛泽东个人而言，都是在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时始料未及的。当然，在这十年内，毛泽东在从全局上坚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760页。

^② 同上书第757页。

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同时，也采取过一些决策和举措，支持和维护过一些正确的东西，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的错误，还坚持和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立场，领导全国人民顶住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力和威胁，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打开了外交的新局面；他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要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永远不称霸，永远不要做超级大国。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林彪、“四人帮”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多次提出批极“左”思潮和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进行整顿，实际上也是在以最大的努力维护毛泽东思想。但是所有这些，在当时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而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只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才有可能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发展。

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思想在延安时期经过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达到成熟后就已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在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已得到确认。当时通过的决议稿写道：“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建国以后这个决议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作为附录公开发表时，由于当时毛泽东本人提出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因而将“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这句话删去了。当时提出不使用这个提法有当时的背景和考虑，党对于毛泽东著作中所体现的科学的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这一评价并没有改变。在60年代初，党重新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这是毛泽东同意的。他强调毛泽东思想产生于“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粉碎“四人帮”后，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割裂、歪曲和篡改，邓小平在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

解毛泽东思想时,重申“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①,“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②。

当然,在不同时期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内容的概括是会有所不同的。

在延安时期,除第一个历史决议外,陈毅、张闻天和刘少奇等在论述毛泽东的路线、思想、理论的作用时,实际上都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内容作过概括。陈毅在1942年7月为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发表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创立了“正确的思想体系”。这五个方面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张闻天在1945年5月中共七大的发言中,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时强调了下述九个方面: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的思想,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关于中国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与长期性的思想,关于首先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根据地以发展全国革命的思想,关于正确解决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的思想,关于建立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及其内部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关于人民战争的全套战略战术的思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0页。

② 同上书第41页。

想,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关于建党、建军、建政的思想。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时也论列了九条: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这几种不同的概括虽然论列的角度和分类的详略不完全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着眼于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和创造性,主体内容属于夺取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经验总结。

在中共七大以后和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如何重新审视包括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内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本内容作出新的概括,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1964年人民出版社内部出版了田家英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一书,虽然是著作摘录,但专题的设立和划分,体现了编者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基本内容的认识。此书共分六编:一、关于人民民主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政策;三、关于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关于青年问题和妇女问题;四、关于党的建设;五、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六、关于战略与策略。

目前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基本内容的概括有三种不同的思路:一是沿袭论述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模式,将毛泽东思想内容也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来进行概括;二是按照党和国家工作的领域和方

面,即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的建设及国际关系等方面来概括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诸多理论内容;三是从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视角来论列这个体系的多方面内容,即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阐述的六个方面和三个基本点。

这三种不同的概括方式各有根据,也各有特点。但相比较而言,还是《决议》的概括更贴近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特质。这个概括的基本思路,有这样几个显著特点:第一,更能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再去领导革命,而是相反,在直接领导革命的实践斗争中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才创立毛泽东思想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方式不完全一样。三个组成部分的概括方式比较适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特质,但用来概括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就不如《决议》的概括更能突出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实践性特质,第二,更能突出毛泽东思想的民族性。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①。尽管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但在民族性中也包含普遍性,它对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对一般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也能提供一种参照。《决议》的概括比较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这一特质。第三,更能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毛泽东思想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3页。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有许多独特的理论内容。《决议》着意从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角度来建构体系,当然比其他概括方式在表现形态上更能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这一特质,使其一系列独特创造能一目了然地展现出来。第四,更能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层次性。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系统,内容很丰富,且具有多层次的特点。《决议》建构的六个方面和三个基本点的体系,比目前的其他概括方式更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特质。

当然,强调《决议》的概括更能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诸多特质,既不是说这种概括方式已尽善尽美,无可改进,无须发展,也不排斥其他两种概括方式有各自的优点,还可继续展开研究,乃至提出更多的概括方式。《决议》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体系建构的第一个完整的(包括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表达形态。如同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还在发展而没有完结一样,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态也应当允许发展,允许进行新的探讨,实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在,我们以《决议》建构的体系框架,来叙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容很丰富。毛泽东本人在一些论著中从不同角度或不同侧面作过概括,强调过它的某些基本点。这里着重概述三个方面的内容:

1.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探讨,不断地加以丰富和完善,才最后于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条总路线作了上述科学概括。它明确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坚持这条总路线,实质上是坚持无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从政治上说,最关键的是要解决这样两个问题:

一是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且是这个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基本力量。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不和农民问题密切地联在一起。解决农民问题是解决一切中国革命问题的最主要的问题。无产阶级只有和农民建立巩固的联盟,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掌握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实现对农民的领导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这主要有:第一,彻底解决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实行土地改革,摧毁封建剥削制度,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变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在对农村的阶级关系和经济状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等斗争的农村阶级路线,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对于地主阶级,实行在政治上

打倒，在经济上消灭，在生活上给出路的政策。第三，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后，提倡根据自愿原则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道路，发展农业生产。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大国里成功地解决了农民问题，使之激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革命能量，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二是正确地分析中国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要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中国的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建党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即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并进一步加以区分，制定正确的政策，还是在抗日战争中期。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需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革命发展的特定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建立统一战线，这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创见。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并不多。在中国共产党怎样与国民党建立或保持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共产国际的指导往往（不是全部）是不中肯甚至是错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如抗日战争）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的一系列政策和策略。它包括：“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同王明“左”倾路线搬用过的斯大林的公式“基

本的打击方向是使中间势力孤立”很不相同)；“以斗争求团结”(这同在中国先后发生过的“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一切斗争，不要联合”的公式很不相同)，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要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等。中国共产党坚持这些正确政策，领导人民革命力量渡过了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最后夺取了全国胜利。前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所以在解放战争中加上“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由两大敌人变成三大敌人，就是因为抗战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英美派官僚统治集团，一方面在经济上通过抗战大发国难财，抗战胜利又大发“劫收”财，聚集了巨额资产；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决心消灭在抗战中壮大起来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和革命力量，发动内战，实行独裁。这样，他们就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表明，中国大资产阶级全部地走向了反动，成为第三大革命对象。毛泽东思想中的有关统一战线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也是对世界政治斗争理论的重大贡献。

2. 以长期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和农村包围城市为主要特点的中国革命发展的独创道路。

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既无议会讲坛可以利用，也无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国情决定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是人民军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

任务是，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可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当然，由于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革命自身力量的暂时弱小，这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革命力量需要经过长期的积聚和锻炼，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中国的武装斗争具有自己的极大特色。它不同于法国的巴黎公社，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有如前述，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广大的农村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中国南方农村一些重要地区经过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群众条件。这样，党将革命工作的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既是必须的，又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的发展形式是：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暴动，组织革命军队，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游击战争，进而建立拥有革命政权的农村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成促进革命向前发展的军事上、政治上的伟大阵地，经过长期斗争积聚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步地改变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最后攻占敌人盘据的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这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发展道路。这是已经得到实践

证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

3. 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纲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于受十月革命影响,无产阶级及其基本同盟者的政治力量比较强大而资产阶级比较软弱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以及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都作了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中国民主革命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首先当然不应该是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已经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证明是完全破产了;其次,中国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企图建立一个旧式的、如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这种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再次,中国在革命胜利后也不适于马上建立一个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①。这种共和国实行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一切反帝反封建力量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其他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是决定国家命运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基本政治力量，也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拥护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人们采取团结政策，给以一定政治地位，以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各级政府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政府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就是改革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种国家所有的经济，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对于民族资本，在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不操纵国计民生的条件下，允许其发展，采取保护政策。在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在一定时期允许富农经济存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最初概括为由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三者构成；到建国前夕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概括为五种经济成分：“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①这里要指出的是，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除了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外，在中共七大作口头报告时还有一段很重要的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

释。他说：新民主主义经济包括要相当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在我们党内长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想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由封建经济进到社会主义经济。这是一种错误的思想。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经济当作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的同志急得很，不要急嘛。毛泽东 1948 年《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还批评过在土地改革中破坏工商业和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落后的、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思考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以至新民主主义的整个政策，根本的出发点，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生产力标准”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运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为其服务的。这种新文化，应该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亦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79 页。

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已得到初步实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普遍实施。

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但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使之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革命阶段如同上下相连的两篇文章，只有上篇做好了，下篇才能做好。毛泽东多方面地论述了这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既批判了混淆两个革命阶段，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左”的错误倾向，也批判了截然割裂两个革命阶段，以为两者之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的右的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② 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就是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联系到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导中国整个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上篇和下篇；考虑到社会主义建设将要经历比民主革命长得多的时间，也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9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651页。

论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的绪论。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虽然经历过曲折和挫折，但仍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有的内容已在前面提及，这里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

1. 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1953年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宣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后来的实践证明，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比原来的设想（三个五年计划）长得多的时间。社会主义改造所需要的时期，原来设想也是三个五年计划。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提出对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的确是当时的客观需要。因为，第一，主要由没收官僚资本而来的、在有计划工业化建设中得到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当时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其他经济成分的优越性，是一支欣欣向荣的新生力量，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第二，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社会生活中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在农村，主要是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和

私营经济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已经有过几次大的较量。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这些矛盾的加剧,使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限制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日程。第三,党已经积累了在农村和城市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经验。在农村,土地改革完成后,简单协作的互助组已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土地入股的初级合作社已开始发展,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合作社也有若干典型试验。这实际上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在城市,在同资本主义经济反抗国家限制的不法行为的斗争中和合理调整工商业的过程中,国家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这不但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和限制,也引起了它们在生产关系上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化,从而也就事实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第四,从世界形势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系列的人民民主国家,形成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社会主义阵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军事上侵略威胁,经济上封锁禁运,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敌对立场;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则支持和援助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这样的世界格局,也是促使我们党明确采取社会主义改造步骤的一个国际因素。以上诸多情况,可以视为研究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改变原来的建设十年、二十年以后一举实行社会主义国有化和集体化的设想,提出从现在起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历史根据的重要参照。

1955年夏季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错误地进行了“反右倾”

的斗争，这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猛烈地加速和急促地完成，比预期的时间大大地提早。在后期工作中发生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失误，以致在长时期内遗留了不少问题。尽管如此，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仍然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就对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和平改造而言，这也是一个创举。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但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中国共产党根据很不不同的历史条件，对民族资产阶级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包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它的分配政策，即资本家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左右作为股本的红利，而其余则分别归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和职工福利奖金。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还同意只接受一定时期内按核定的私股额每年领取定息。这样，我们党就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先驱们提出过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这些宝贵经验决不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业生产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而失去意义。现在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合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水平的经营形式，它在土地公有、大型农田基本设施公有、乡镇企业大部公有、乡村两级经济组织对个体农户的生产和经营进行协助、服务和调节（即“双层经营”）等方面，都继承和巩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成果。

2. 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创立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人民民主专政也变成了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政权。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国家政权之所以仍然继续采取人民民主专政这种形式,是因为我国无产阶级的队伍虽然迅速扩大,但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离开工农联盟,单靠无产阶级既不能形成大多数人的统治,也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人物,仍然参与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我国特殊的历史国情,是决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仍然必须采取人民民主专政形式的根本因素。

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上,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的处置上,同传统的无产阶级专政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是“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还是“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前者是无产阶级单独地掌握国家政权,后者是联合农民和城市小所有者参加国家政权),都是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尽管设想过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可以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但没能成为现实,因为俄国资产阶级反抗苏维埃政权。在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不仅享有选举权,而且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民主权利。他们的成员及其代表人物还参加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组织和管理

工作。这样，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呈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存在着广泛的政治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同时包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消灭之后，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二是在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存在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广泛的阶级基础相适应，在政党政治方面也承认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民主党派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力。这些原来基本上属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逐步变成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团体，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的机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广泛性、多样性和活泼性。我们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不仅在内容上符合我国国情，在概念表述上也有其突出的优点。它比较明白、确切地表达了我国国家政权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在阶级关系上，本来就包括民主与专政两个方面的职能：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阶级、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直接标明了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两个方面。毛泽东多次讲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

民主专政。”^① 还指出：“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②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担负着人民民主和人民专政的双重任务。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使人们很容易理解我们国家政权的性质、内容和职能，有利于在实际工作中防止误解和片面性，因而这个提法是科学的，并为广大人民所接受。

3.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就已事实上提出来了的一个问题。延安整风，形成了“团结——批评——团结”这样的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方针。这种方针，推广到党外，用于处理解放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实际上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1944年9月，毛泽东在招待中央留守兵团学习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不难看出，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加以区分的思想实际上已经形成，尽管还没作出理论的概括。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毛泽东等领导人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1949年，毛泽东先是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要划清革命与反革命和正确与错误的两个界限问题，接着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要分清人民和反动派的界限。1951年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0页。

6月,刘少奇又提出要区分敌对矛盾与非敌对矛盾的界限。1955年5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分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这些都是我们党明确提出两类矛盾学说的先导。

我们党关于两类矛盾思想的大发展是在1956年以后。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比较突出地暴露出来。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群众性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也突出出来,小范围的工人罢工、农民闹社、学生罢课等事件时有发生。这样,正确认识与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着重并反复加以思考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和党中央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研究并回答了我国国家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先后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根据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的讲话《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人民日报》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12月)和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等著述,科学地阐明了关于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基本观点是: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它们既有基本适应的一面,又有不相适应的一面。这个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一般地不表现为对抗性的矛盾冲突,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

——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就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是敌对阶级或政治势力在根本利益冲突的基础上的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指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产生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如果处理得当，敌我矛盾有的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处理不当，有的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性矛盾虽然分为两类，但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是大量的，而且愈益上升为主导地位。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视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或“总题目”。刘少奇则直接把它视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随着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对敌我矛盾，采用专政的方法。对人民内部矛盾，采用民主的方法。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强调要普遍提倡和善于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如在经济方面实行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在科学文化方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对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的政策；处理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等等。对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毛泽东都强调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两条根本原则，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绝对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倾向。

在毛泽东看来，研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种科学”。

后来由于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的发展，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实践中我们党没有很好地贯彻严格划分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要求。但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种复杂问题，促进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仍然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实践证明，这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重要发展。

4.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探索过程中虽然自 50 年代后期起走过较大的弯路，遭受过严重破坏，但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仍然获得了不少适合我国经济建设发展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认识、思想原则和方针政策。其中许多是毛泽东提出并付诸实行的，有些是毛泽东提出但没能很好实行甚至后来改变了的，有些是别的同志提出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有些则没有得到毛泽东支持甚至受到他的批评。但是所有这些，都属于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尽管有的还不很完善，也不完全适合后来发展了的情况，只要其基本思路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应当视为宝贵财富。这主要有：

——关于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总体水平较为低下，形象地说是“一穷二白”，这是我国

的基本国情。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随着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国内的主要社会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虽然是对我国政治形势的估量，实则也是对基本国情现实状况的动态分析和社会主义经济目的的根本规定。这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样，党的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①，就是“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②。毛泽东在1957年3月南下视察时甚至还说过，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四十多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在1958年初又提出要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来。

——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国家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地和不断地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③，这就决定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④，还提出了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思想。这些，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71—772页。

② 同上书下册第770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22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4页。

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体现,也是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开拓出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在努力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道路。毛泽东鉴于苏联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片面追求重工业发展,以致造成国民经济畸形格局和市场供应长期短缺的教训,强调经济建设要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提出以重工业为中心,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要按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进一步强调必须把发展农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首要地位。

——关于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的原则。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除了需要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外,毛泽东还提出需要处理好其他一系列重要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利益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关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的关系,等等。毛泽东的一个总的指导原则是:“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①,各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2页。

面的建设事业在发展,会遇到很多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①。

——关于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这就是周恩来所指出的:“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② 这是要求经济建设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急躁冒进的方针。陈云进一步阐发这个方针,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观点,并对综合平衡的要求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③;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物资、财政、信贷三大平衡,这是经济建设中最基本的平衡关系。这些理论观点对我国 50 年代、60 年代的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思考。毛泽东提出过,中央要向地方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不久,面对全盘公有制和全盘计划经济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毛泽东一度提出,只要有社会需要,还可以允许开设私人工厂,允许私营大厂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刘少奇也说过,可以允许资本家盖工厂,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83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18 页。

③ 《陈云文选(1956—1985 年)》第 202 页。

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可以作为补充,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周恩来也提出过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以个体所有制为补充的思想,认为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搞一点私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点有好处。陈云对工商企业的购销关系、生产经营形式、市场管理和物价政策等方面的关系作过长时间的研究,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些思想虽然由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行,但的确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某种改革的最初的设想。

——关于发展商品生产,重视价值规律的思想。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过程中,毛泽东就商品生产姓“资”姓“社”问题发了一通精彩的议论。他在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联系,就不是资本主义,就出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不要怕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历来就有商品生

产,现在加一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在1959年2月底至3月初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又强调要重视价值规律。他说: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在3月下旬的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在修改刘少奇的工作报告时写道:“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决不能不严格地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上的认真思索,虽然他的这些思想没有能够贯彻到底,后来在实践中对商品生产的限制仍然很多很死,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就是割商品生产的尾巴,在理论上又提出商品制度是“资产阶级法权”(现译“资产阶级权利”),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但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历史,毕竟应当承认这些思想是值得重视的闪光的思想。

——关于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的探索。

毛泽东非常强调改善企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在50年代末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这就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改革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随后,在“工业七十条”中进一步强调,要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生产技术民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个管理制度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管理现代企业来说,自然不完备,但就它的核心是体现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这一点而言,为企业管

理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在 60 年代初期,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明确分工,个人负责”的生产管理制度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自从合作化以来,由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自发创造的包工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一再涌现出来;1962 年曾经在百分之二十的耕地上推广,一度受到中央许多同志的关注和赞同;虽然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被压下去了,但是追根溯源,不能不承认它们正是新时期农村改革的源头。

——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的思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是十月革命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提出的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将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没有再将社会主义划分若干阶段。列宁虽然使用过“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概念,但也没有将社会主义作明确的阶段划分。在纠正 1958 年产生的狂热地企图几年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思想之后,毛泽东反思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经验,在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曾经谈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这个思想有助于克服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盲目情绪,也是试图为全国人民继续艰苦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理论指导。当然,那时的这个思想是不明晰的,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性和这个阶段的许多特点和要求,远没

有现在这样看得清楚。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和发展战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艰辛求索的奋斗目标。50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就在为实现怎样的现代化进行思考，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形成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虽然四个现代化包括的四个方面，提法先后有所变化）。至于实现现代化的时限，中共八大一次会议时大体设想要到本世纪末。“大跃进”中一度有过“两年超英”、“七年超美”的狂热设想，以后冷静下来了。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五十年，就能做到，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从而提出了“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口号。随后，在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两步走”的战略设想。1964年底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这个设想：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975年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上重申了这个设想。实践证明，这个战略设想的时间还是快了；但是，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引向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思路如果能坚持下来，是极好的，可惜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确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沿着这个思路，逐渐明确地提出了分“三步走”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样的战

略目标和步骤。

(三) 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 军事战略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情况之复杂,战斗之严酷,在世界现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通过前述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可以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在每个革命阶段都作过一定总结,最后创立了具有完整理论形态和科学体系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亦即毛泽东思想的军事理论。这里从总体上概述它的主要内容。

1. 关于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

军队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要成份是农民。毛泽东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毛泽东思想关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确立这个宗旨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首要前提,也是为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所决定的。这是我军一切行动的准则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我军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真诚拥护和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1947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明确宣告:“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

志。”^① 人民军队的“三大任务”，即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生产，生动地体现了这一宗旨。因此，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

——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② 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使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在党领导人民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以后，这个军队也就是属于人民、属于国家的军队。党对军队的领导，首先是思想上的领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教育军队，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忠于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军队。其次是政治上的领导，使军队成为执行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成为贯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的武装力量，在人民的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就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的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武装力量。最后是组织上的领导，坚持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系统，并使之成为军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政治建军是无产阶级治军的根本。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实现人民军队宗旨，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各项任务的保证。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它的基本内容，“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教育军队，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37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547页。

军队,使革命军队内部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与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趋于一致,使革命军队完全服从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军、协和友军的工作,达到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其他军队的原则区别。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就是指的这个意思”^①。这段话的许多具体提法,从属于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但它的原则精神,是有普遍意义的。

——坚持革命纪律和民主制度的高度统一。人民军队必须建立严格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毛泽东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这种纪律的集中体现,是人民军队必须坚决执行的纪律准则。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反动军队的重要标志还在于,它在坚持高度的革命纪律性的同时,还坚持实行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在内的革命民主制度。它充分体现了人民军队的特点,是我军团结内部、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

2. 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

人民战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在战争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也是我军军事战略战术的基础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极为丰富,主要点是:

——人民战争要以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基础。早在土地革命

^① 1944年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政治工作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见《红旗》1978年第8期。

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②。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④；“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⑤。在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数百万正规军和美国的原子讹诈政策，毛泽东又说：人民才是真正强大的力量，人心向背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⑥。

——人民战争要建立野战军、地方部队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土地革命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之际，毛泽东曾指出：“人民的游击战争，从整个革命战争的观点来看，和主力红军是互为左右手，只有主力红军而无人民的游击战争，就像一个独臂将军。根据地的人民条件，具体地说来，特别是对于作战说来，就是有武装起来了的人民。敌人视为畏途，主要地也在这一点。”^⑦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明确指出：“我军主力集中歼敌的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39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511页。

④ 同上书第2卷第480页。

⑤ 同上书第2卷第511—512页。

⑥ 同上书第4卷第1195页。

⑦ 同上书第1卷第227页。

候，必须同地方兵团、地方游击队和民兵的积极活动，互相配合。”^① 进行人民战争，不仅要以人民军队为骨干，而且要实行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全民武装、全民皆兵的原则。这种多方力量相结合的体制能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形成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

——人民战争要实行全体总动员。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实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实行全国的军事总动员和全国的人民总动员，以武装斗争为主，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斗争结合起来，形成全面的人民战争。这个思想具有普遍意义。人民战争不只是孤立的武装斗争，它需要在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的前提下，同其他各条战线的斗争和各种形式的斗争直接地和间接地配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民总动员，使广大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知识分子等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群众和各党派、各阶层、各人民团体的力量都紧密地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共同对敌；使前方、后方和敌占区的每一个村庄、工厂、学校都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坚持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城自为战，陷敌人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3. 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中国革命战争由于长期处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弱小的革命军队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不能不特别讲究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不断总结我军作战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9页。

套在中外军事史上最为巧妙和罕见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其中主要有：

——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防御，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以便保存军力，创造有利条件，进行战略反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实行战略进攻。贯彻这个方针，要求在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时，在战役战斗上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中的优势；依据敌我双方力量消长，适时进行以调整主要作战形式为基本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进而将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和战略追击。这在军事理论上是一个伟大创造。它把防御和进攻辩证地统一起来，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紧密结合起来，即攻防结合，防中有攻，攻是为了防，防是为了转入攻，在防御中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为转入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这是在中国革命特殊条件下，将我之战略劣势转为战略优势，使革命力量最后在总体上超过敌人、战胜敌人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地位。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采取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在战役或战斗中采取哪种作战形式，依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军事态势等诸多条件决定。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战争在长时期内的主要作战形式。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形成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江西反“围剿”斗争中又形成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和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抗日战争爆发后，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地位（有如前述，这是军事史上没有过的创造），形成了

“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但即使如此,也十分注意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三种形式的相互配合。到解放战争和建国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随着军事力量的强大,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某些情况下的阵地战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作战形式。

——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是我军的主要作战要求。集中优势兵力,包围全歼敌人,是达到这一要求的主要作战方法。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提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①。在1938年的《论持久战》中,他强调:“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②在1946年起草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指示中,他明确指出:“在蒋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这种战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这种战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③。随后,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实际上也是以这个原则为核心而展开的,因而这个原则是最主要的军事原则。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224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491页。

③ 同上书第4卷第1197—1199页。

——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指挥原则。毛泽东有段名言：“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 这就是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本人驾驭中国革命战争舞台的写照。他总结了争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一系列指挥原则，如知己知彼，力争主动；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既要依据战争的相对的确定性制定计划，又要视战争情况的流动性而改变计划；尽可能乘敌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等等。

4. 关于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

建国以后，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空前的壮大，由单一的陆军发展成为包括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在内的合成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得到了加强；部队的素质和技术装备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处在相对和平发展时期，但世界和平经常遭到破坏，国防安全不时受到严重威胁，先后发生了抗美援朝战争和中印边界冲突等事件。为了保卫和平，保卫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毛泽东提出了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的革命武装力量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许多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2页。

重要指导思想,努力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防现代化建设道路。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很注重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认为现代条件下的未来反侵略战争仍然靠人民战争。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就是发展了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传统,加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和技术装备。人民军队的建设首先是革命化建设,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还必须加强正规化建设,即全军实行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培养严格的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所谓现代化建设,既包括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也包括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也要有氢弹,还要搞导弹。在国防技术装备上实行常规武器与尖端武器相结合的发展目标;在军事科学研究方面实行以我为主地发展军事理论和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相结合的发展方向;在国防工业体制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

现代战争无疑会出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也需要发展。但是,上述毛泽东思想的许多军事理论,包括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其基本的精神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四) 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

政策和策略是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活动的准则,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道路生动地说明了这

个问题。毛泽东总结了 中国革命前进与后退、顺利与挫折、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不断强调政策和策略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和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同这种或那种政策相联系的。”^① 因此，他强调：“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② 为了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尽量减少错误，避免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关于政策和策略的一系列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是各个时期、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的总的指导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

1.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这是毛泽东关于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策略思想。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方面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它们的反革命统治和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极为残酷；另一方面革命力量相对弱小。这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经过长期的和残酷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这也决定了在革命过程中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反对革命的急性病和冒险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看不到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以为中国革命顷刻就会成功，这是不切实际的；二是反对过高估计敌人和害怕敌人的悲观主义倾向，它们被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285 页。

^② 同上书第 4 卷第 1298 页。

革命的暂时的汹汹气焰所吓倒，不敢去夺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形成了一种认识，即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两点论来认识敌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①反动派的基础是虚弱的，脱离人民，内部分崩离析，已经腐烂，没有前途；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属于人民，革命的人民要有信心战胜一切反动派。以这个认识为基础，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战略策略思想：“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②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就是指在整体上和全局上反对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和惧怕敌人的思想，相信革命的人民能够战胜他们。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就是指在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要认真研究和对待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决不可粗心蛮干。毛泽东解释这个战略策略思想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它，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5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499页。

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一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①

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也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它不只是适用于对敌斗争，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其他工作。实际上，对待任何困难都应采取如此态度。一方面藐视困难，决不在困难面前畏缩不前；另一方面重视困难，一个一个地加以克服。毛泽东在1958年底的一篇文章中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上对这个思想作了高度的普遍概括。他说：“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过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进步人类，首先是共产党人，“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②。这段深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9—50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07—808页。

刻的议论不仅对于分析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而且对于认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

2. 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

这是毛泽东的主要矛盾论在对敌斗争策略上的具体运用。按照这个策略原则,在每一个时期和每一场重大斗争中,一定要把斗争的主要方向指向当前最主要的敌人,不要树敌过多,必须把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争取到自己方面来,至少使他们暂时中立,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历史经验证明,在对敌斗争中,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敌人,有利于整个斗争任务的解决。抗日斗争的历史发展,是我们党运用这个策略原则的成功典型。我们党紧紧抓住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把斗争的主要方向对准了日本侵略者,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参加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不仅发展了人民的革命力量,也为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作了准备。

正确执行这个策略原则,必须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明确战略目标与策略方针的区别。对于革命的一切敌人,人民都需要统统将他们打倒,不能打倒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是就革命的战略目标而言,绝不是指斗争的策略方针。作为策略方针,在一个时期的打击方向只能有一个,不能同时提出许多打击目标,树立许多敌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教条主义提出“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军阀”的口号所以是错误的,从战略目标与策略方针的关系而言,就在于混淆了两者,没有正确提出打击的主要对象。毛泽东批评说:他们“不会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击当前的最中心目标,而把目标

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这个叫做不会择敌和浪费弹药”^①。第二,必须善于区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明确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然后予以区别对待,努力将那些可以争取的次要敌人变成间接同盟军。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复杂矛盾状况作过透彻分析,认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同各部分敌人之间的矛盾处于不同地位,有的突出起来成为主要矛盾,因而是主要敌人;有的暂时退到次要地位,成为非主要敌人。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在于适时地把握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确主要敌人,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在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对各敌对阶级和集团的每一部分情况作出具体的区别,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如在农村,既要在地主和富农加以区别,还要对大中小地主以及地主富农中的恶霸(地主阶级当权派)与非恶霸加以区别;既要带对带有民主色彩的开明绅士和一般的地主富农分子加以区别,尤其要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地主富农分子加以区别,如此等等。毛泽东指出: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党的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区别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制定正确政策和策略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基础。

3. 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这是与掌握斗争方向,不要四面出击相联系的又一个策略原则,也可以说是其延伸。这个策略原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高超的领导艺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敌斗争的策略思想。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曾指出:“要战胜更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4页。

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①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上卓越地运用了列宁的这个策略原则，而且在理论上作出了新的概括。

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前，在论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完全是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过去这种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这不过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②。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将这个原则概括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十六个字，运用得炉火纯青，使党和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渡过了一次又一次惊涛骇浪，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被动状态变为主动状态，由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第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8页。

对国民党的劣势变为对国民党在许多方面居于实质上的优势，成为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将这个策略原则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派生出了许多重要的具体政策和策略。如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同顽固势力作斗争时要有理、有利、有节；在反动统治地区，要把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方式上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对于反动派的狡诈权术，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反对其反革命的两面政策等。毛泽东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买办集团。然后，再去反对美英侵略势力，打倒亲美、亲英的买办集团。地主阶级里头也是有派别的。最反动的是少数，那些爱国的，赞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就不要放在一起打。”^① 这是对策略原则的生动说明。

4.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

这不是一个具体的策略原则，却是把握策略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说：“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② 而要实现这两者的统一，就必须：第一，在不丧失正确的战略要求（政治目标）的原则下，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等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政策和策略，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出适应情况并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8—309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436页。

群众所能接受的行动口号。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提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的口号；在抗战中期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在抗战后期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在抗战结束后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这都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适时提出来的动员群众的口号。第二，要善于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妥协——叛变性妥协和革命性妥协，适时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毛泽东在反对“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既严厉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原则、出卖革命利益的退让妥协；也严厉批评了王明“左”倾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不妥协”，阐述了革命的妥协让步的必要性。他说：“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①这样的妥协和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②。第三，正确对待谈判，积极利用谈判，针锋相对，力争主动。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有利于革命事业发展的谈判。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与不同的对手，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谈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许多著名的谈判，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重庆和谈、朝鲜板门店谈判、日内瓦谈判以及中美关系谈判等等，都是体现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8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154页。

灵活性相统一的典范。毛泽东、周恩来既是大政治家，又是大谈判家。在他们的领导下进行的谈判或他们直接参加的谈判，从来不是消极的妥协、让步，而是使谈判成为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在战争期间或对立状态下，谈判对手往往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或其他条件下得不到的利益，使谈判难以达成协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谈判不是战场，但却酷似战场甚至胜似战场。在这种情况下，谈判每取得一点进展，都必须经过艰辛努力。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直至成功，就要善于掌握谈判时机；善于在谈判中取得主导地位；善于利用谈判揭露对方，教育民众，争取社会舆论；有时谈判需要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有时则需要绵里藏针，外柔内刚，等等。这些经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策略原则。

上面讲的大都属于对敌斗争的战略和策略。在对同盟者的政策和策略方面，毛泽东也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如：党要实现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等等。

（五）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充分发挥它们对于整个革命工作的巨大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

现。”^①这个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为根据而形成的关于思想和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是他在这方面的许多重要论述的理论上的出发点。

1.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
本保证，一向在党的各项工作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早
就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
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②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和要求是：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我们党首先
在革命军队工作中形成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基本观点，
后来推广运用到党领导的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之中。“生命
线”是表达其重要性、关键性的形象说法，思想政治工作能使各
项工作沿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确定的方向前进，能使人们
的思想认识统一，政治觉悟提高，积极主动地去做好各项工作。
这里首先要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合乎实际、代表
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思想政治工
作就发挥出正确的作用和伟大的威力。如果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发生了错误，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为贯彻执行错误的路线服务，
那就会加深错误，党在这方面是有深刻的教训的。所以，思想政
治工作还要根据实践结果、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去检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来就包括根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3—664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1094页。

据群众实践来检验党的政策这个环节,这是领导方法的群众路线,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遵循这样的群众路线。

——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毛泽东强调:“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① 这里的政治观点是广义的,从坚持革命的政治立场,到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态度,都包括在内。因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也很广泛,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路线和政策教育,当前形势和任务教育,理想、道德和人生观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等等。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也要多样,要寓各种教育于各种活动之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人们对整个世界和人生有一个科学的认识,树立起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和饱满的工作热情,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思想政治工作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我们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要互相结合,互相促进,既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也反对空头政治家。离开思想政治工作,革命和建设无疑有迷失方向,走上邪路的危险;但是离开经济工作、技术工作和其他工作,革命和建设断无成就。实行两者的统一和结合,才能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的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重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同样重要。党在这方面有丰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0页。

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好的方法,也有过方法简单粗糙的深刻教训。毛泽东强调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①“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②实践证明,这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唯一正确的方法。

2. 关于文化工作的理论。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中国革命要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要“有文武两个战线”^③。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胜利后是新社会新生活的重要建设力量。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文化工作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工作、教育工作、新闻工作等等,我们党都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比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就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代表作。这里仅仅介绍有关文化工作的几个属于总体方面的思想:

——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论述。他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2页。

② 同上。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47页。

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①当时提“民族的”,首先是指其在内容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同时也是说明文化的形式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吸收世界各国一切先进的好的文化,为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而努力。“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②。“科学的”,即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里首先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同时也包括自然科学和其他用科学态度来从事的研究。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文化,既要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也要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尊重文化的历史发展,既不颂古非今,又不菲薄历史。“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它要求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使广大民众成为革命文化运动的主体,成为“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③。上述“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三个要素的结合,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崭新的文化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④这个“高度文化”不是别的,就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有机统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709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707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708页。

④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692页。

因此仍然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特征。现在我们通常用“二为”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来简要地说明我们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百花齐放，是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时采用的；百家争鸣，是1953年毛泽东对《历史研究》杂志创刊所作的指示。把这两个口号连在一起，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基本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是在1956年形成《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这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毛泽东还曾简明地把百家争鸣概括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论述这个方针的时候，讲到了自然科学历史上哥白尼、达尔文学说曾经遭到压制的情况，讲到了苏联在遗传学中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批判摩尔根学派的教训，也联系到我国建国以来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左”的做法。对这后一方面的教训，当时还缺乏必要的总结，最突出的是胡风事件。胡风是长期参加进步文艺运动的评论家。对他的文艺思想，进步文艺界历来有不同意见。这本来应该属于百家争鸣的问题，但是1955年把这种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并且迅速变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和肃清，在没有经过核实的证据的情况

下逮捕了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党内外进步文艺工作者，造成一大冤案。然而，当时对这个事件上的错误还没有认识，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在肯定“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遭到严重的背离和破坏，并且被用“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重新作了解释。在1961年，同整个调整政策的进程相适应，在科学文化领域也初步认识和着手纠正违背“双百”方针的“左”的错误。在《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文件中总结了若干教训，规定了贯彻执行这一方针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这个健康过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又被中断了，文艺、学术领域又展开了一系列错误的过火的批判，“双百”方针遭到更严重更长久的破坏。结束“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从过去沉痛的教训中提高了在文化工作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二为”、“双百”，成为党的文化工作根本方针的两个基点。

——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这八个字的方针虽然是毛泽东在1964年春明确概括的，但这个思想早已有，在《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许多著作中都有论述。古为今用，就是对历史文化遗产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而不是全盘照搬，要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将其中有益的成分用来为现实服务。洋为中用，就是学习外国文化成果中有益的东西，用来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服务。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

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①这个方针同“双百”方针一样，也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针。

3. 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

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知识分子。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如此，在中国的现代革命斗争中也是如此。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一些基本理论。这里着重指出这样几点：

——在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上，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广大知识分子，除极少数外，都具有反帝爱国的革命性，进步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③。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把革命知识分子看成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力量之一，确定了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重要地位。在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巨大作用，指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④。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4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③ 同上书第2卷第751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页。

——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上,提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人们往往认为,这是党在1956年才提出的,其实这个思想在建国前夕已经有了。在1948年,在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已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归入“劳动群众”范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刘少奇和周恩来在一些讲话中都讲过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建国初期的一些文件中也讲过国家、合作社、私人雇佣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是以这些认识为基础,并对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各方面的状况及其变化作了全面分析,周恩来在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才明确宣布“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①。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抬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中,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宣布属于敌我矛盾。不仅如此,在理论上还抛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论断,进而提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划分阶级的错误观点,并且从政治上思想上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归于资产阶级的范畴。后来逐步纠正“左”的错误,包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毛泽东在1958年12月作了“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的批语。1962年初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之冕)。接着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的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

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央再次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纠正“左”倾错误的这些成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又被冲毁。知识分子不久又被一般地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并且宣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成为受伤害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纠正“文化大革命”中以至于1957年以来长时期存在的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恢复党重视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作劳动群众一部分的正确思想，成为拨乱反正最先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在对知识分子的期望上，要求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和“又红又专”的道路。党很重视知识分子，同时又对知识分子寄予厚望。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知识分子应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以鞠躬尽瘁的精神献身人民”^①。建国以后，毛泽东继续强调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要进行思想改造，以去掉从旧社会带来的不合乎人民要求的旧思想，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1958年进一步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红，是指政治立场、政治方向；专，是指的专业知识、专业成就。又红又专，就是要求知识分子努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专业成就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思想，在正确地确定政治任务和在确认识识分子是劳动群众一部分的前提下，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要求。

^① 《在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讲演》，1944年11月1日《解放日报》。

（六）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的建党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①。这个理论的内容很丰富，它的核心是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解决密切地联系起来。当着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时候，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就前进一步；当着党的政治路线出现错误的时候，党的建设就后退一步。所以党的建设问题的前提是要正确地确定党的政治路线。在这个前提下，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建设理论，这里着重概述下面四点：

1. 特别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

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毛泽东建党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就是强调经常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改造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不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中大量吸收党员，一是他们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愿意献身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二是在中国没有农民政党，他们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具有历史的必然。他们加入党的行列，对于无产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1页。

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利的。但是，他们在入党以后又不可避免地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以及其它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带到党内来，影响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同时，党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中，中国社会上有深厚历史根源和巨大渗透力量的各种落后的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党内，不用说来自非无产阶级的成员会受到这种影响，就是出身无产阶级的也很难不受到这种影响。因此，毛泽东、刘少奇提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党内“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①，“最本质的矛盾”^②。解决这个矛盾，是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所必须的。从井冈山时期起，毛泽东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到延安时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成熟了。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就是要在党内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研究，努力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我们党在二三十年代的一个显著弱点，就是理论准备不足，队伍的理论素质不高。刘少奇说：中国党艰苦奋斗的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并不弱，“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③。毛泽东也说：“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③ 同上书，上卷第220页。

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①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这次学习,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对于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起了巨大作用。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一个突出表现是提出了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的著名观点。毛泽东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②为了解决思想入党问题,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1941年7月,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号召所有党员“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等名篇更是增强党性修养,确立共产主义的价值观、人生观的生动教材。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我们党还创造了“整风”形式。这就是在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之外,集中一定时间,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整顿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① 1940年6月28日《新中华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5页。

以提高广大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增强党性,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延安整风运动是用整风形式强化党的思想建设在总体上获得巨大成就的实践。

2.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自己的作风建设,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宣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①。把党的作风问题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并作出“三大作风”这样的概括,这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个概括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积累的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毛泽东思想的党的建设理论的创造性成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要实践。这就决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作风,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毛泽东认为,注重不注重、实行不实行这种结合,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共产党人的“党性的表现”。“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阶级性的体现。“自我批评的作风”,以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3—1094页。

否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不符合者就作自我批评加以丢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宗旨,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要求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三大优良作风思想的概括,从党的建设这个侧面说明了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臻成熟,因而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成熟性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大优良作风思想的提出,同时是反对党内错误路线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发的不正作风的斗争经验结晶。理论和实践相分裂,是在党内存在较长时间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这个不正之风是延安整风运动所要整顿的首要对象。毛泽东对它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我们党长期以来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教条主义者、主观主义者都是脱离群众的。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骄傲自大的工作态度等项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这类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为它们脱离群众。”^①因此,这些要不得的作风也属整风之列。毛泽东还说:“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②因此,也可以说,三大优良作风思想的概括,是延安整风运动在党的建设上的理论成果。

3. 在党内斗争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

正确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是党的建设的又一个重大课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1096页。

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党内斗争很多,对党内斗争的必要性的论述很多,却很少提出过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斗争的原则。在党内斗争中不能正确区分党内矛盾与党外矛盾、敌我矛盾,把党内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处理党内矛盾,包括犯有错误的同志和意见不同的同志,这种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也有严重影响。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不仅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严重的党内斗争,主要检讨党的历史问题,批判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危害的以王明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和政策。但是,对于这次党内斗争,毛泽东从根本上摒弃了过去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创造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的方针和方法,使整风斗争健康发展,帮助和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教育了全党,增强了党内团结。

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提出,开展党内斗争,最根本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根本利益和革命目标一致基础上,由于对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方面的问题认识不一致而产生的党内分歧,就其实质而言,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①。对于这样的党内矛盾采取团结教育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0页。

新的团结。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个经验说：“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从这个经验里，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或者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①

为了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和要求。例如，关于研究历史经验的态度，提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因此，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避免重犯错误，这样才能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再如，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毛泽东指出，在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这个时期的党，由于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军民群众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在许多地区和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样采用对具体状况作具体分析的方法，有利于对党的历史问题和犯错误的同志作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和结论，团结更多的同志共同工作。又如，对于开展党内批评，毛泽东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认为这“是抵抗各种政治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3页。

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①。整风运动中开展的党内斗争,实行了这些正确的方针和方法,空前地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增强了全党各个方面的团结,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基础。

1957年以后“左”的指导思想逐步发展,从庐山会议“反右倾”到“文化大革命”斗“走资派”,越来越严重的“左”的错误做法,完全违背了毛泽东过去提出的关于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给党的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种正确方针在解决党内矛盾中恢复了它的作用和威力,并得到新的发展。

4. 强调执政党更要加强党的建设。

还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已经在思考共产党执政后能否保持革命的先进性问题。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提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历史教训问题,毛泽东极为重视,把它指定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②。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提出所谓“历史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问题,毛泽东回答: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新路,能够跳出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至“人亡政息”。在1949年春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这前后的著述中,毛泽东在进一步思考,即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2页。

将夺取全国政权而执政的共产党如何不重蹈历史覆辙的问题。他从三个层面提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即，第一，在党内，要牢记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教训，反对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和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第二，对党外，在进城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的捧场和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第三，对国外，要警惕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民主个人主义”来影响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此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如何加强集体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改进工作方法，来改善党的领导等问题。这都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执政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把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放在党务工作的首位，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作出了许多重要决策。可以说，自开国之日起，毛泽东等领导人无时无刻不在重视这一问题。当然，毛泽东晚年犯了“左”的错误，他对执政党的建设的一些认识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不能不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他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观上的动机就包括要解决执政党的建设，即党不变质的问题。党内确实存在一些腐败消极现象，但是由于他对党内矛盾的分析和所采取的解决方法都是错误的，因而不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使党组织自上至下遭到了严重破坏。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就毛泽东思想的党建理论作为正确的理论原则而言，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至少有这样三个问题应当着重加以强调：

一是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从建国之初的整党到中共八大以后的整风，一个主要内容就

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进行过严厉抨击。周恩来论列过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的、非常危险的”,“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①。

二是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和其他腐败现象。从50年代初的“三反”运动到60年代前期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包括这个内容。“三反”运动尽管一度发生过若干过火行为,但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是一次成功的反腐败斗争。城乡社教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总的说不是成功的。

三是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提出“反和平演变”,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是很有战略远见的思想。当然,试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个问题,只能靠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来解决。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22页。

四、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在毛泽东思想各方面基本内容之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样一个概念，并且把它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样三个要点，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科学阐发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准确把握，也是重新建构的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特点，展现了这个体系结构的立体层次，可谓颇具匠心的新颖设计。

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思想，当然不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最先提出的。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已经有了这样的思路。前面引述的恩格斯的名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已说明了这个意思。列宁在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俄国孟什维克的斗争中，也严厉批判了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指出：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这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

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①（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克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在实践中开辟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道路，特别强调要反对本本主义，要注重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毛泽东而言，这个思想贯穿在他的著作、工作和革命斗争的一切活动中。他的许多科学著作不仅是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范，而且还从理论上提出了要善于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不断强调要去掉对待马列主义的错误态度和神秘观点。在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②。在1935年12月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进一步批判了那种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③的错误观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夺取抗战胜利，党中央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在1938年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阐述了对待马列理论的态度问题。他说：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154页。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①。显然，毛泽东这里的观点与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更加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只会片面地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实际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的倾向。1941年9月1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942年2月1日，他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中进一步指出，马恩列斯曾经反复的讲，他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教条主义者“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应用于中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与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创造出理论来，才叫做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还说：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②（着重号为引者所加）的理论家。自此以后，“立场、观点、方法”的提法，成为我们党的理论工作和学习生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提法。几十年来，我们党一直强调这个提法。这

① 《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书店版第927页。

② 同上书第942页。

个思想虽然是马列那里早有的,但突出地强调并形成一个确定的提法,却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立场、观点、方法”,应当说有其历史的原因。首先,这是由中国革命斗争异常的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马恩创立的革命理论是立足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设想和阐发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水平异常落后,且地处亚洲东方,其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与欧美相距甚远,与俄国也有很大不同。在这样的国度里进行革命,既然在马克思的本本里没有现成答案,就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独特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这就需要不拘守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更加艰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次,这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受到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不正确干预,致使中国革命受到巨大危害的情况有密切关系。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帮助;斯大林讲的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与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等思想使中国共产党人也很受教益。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那种不合时宜的体制,由于苏共的大党沙文主义,特别是通过扶植王明等人来贯彻他们的错误主张,曾使中国革命几乎濒于绝境。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抵制、反对和纠正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所支持的党中央某些人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不特别强调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特别强调一切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立场、观点、方法”,是在反

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理论认识。最后，从中国党内的干部状况来看，我们党内有两类干部。一类干部受过高等教育，学过马列理论，这类干部要注意教条化的问题。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则是学历不高，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干部。这些干部在参加革命时没有学过什么马列著作，也不是学好了理论再干革命，而是边干边学，逐渐懂得一些革命道理的。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许多人是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骨干。要提高这样一批干部的理论水平，就要破除他们对理论的神秘感和畏惧感。对于他们，不要求读很多书，也不一定要求把马列著作中许许多多的专门术语、概念、知识、材料都搞清楚，主要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掌握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只要能掌握这一点，就能对马列理论融会贯通，提高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能力。延安整风学习马列理论，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使许多干部受益非浅。这是我们党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的一条成功经验。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精辟地论述过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精辟地论述过群众路线的思想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把这三点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要点，当然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的概括，但是，三者统一的思想萌芽，早已存在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之中。这篇著作是一篇解放思想的宣言书。文中虽然还没有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些术语，但的确初步地阐发了毛泽东后来用这些术语所阐发的一系列思想。它着重讲调查工作，并且把调

查工作提到“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的高度，强调一要反对“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二要反对视马克思为“先哲”的神秘观念，要求共产党人“努力作实际调查”，“洗刷唯心精神”，使政策和策略的内容“适合于斗争中客观和主观情势”^②。它把调查研究同深入群众联系起来，强调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伸只脚到社会群众中去调查调查”，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产生的”^③，说明毛泽东已把从群众中来看作获得正确认识的渠道，开始孕育了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思想。它还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④，首次阐明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是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严正挑战。

综上所述，完全有理由说：《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初步地形成了被视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的雏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要点的概括，不是任意的，而是对毛泽东本人思想认识的概括。

（一）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倡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11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115页。

④ 同上。

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就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从来反对从书本出发,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如前述,早在1920年3月,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就曾经发挥了这样的思想:作为中国人,关于“中国”这个地盘内的情形,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他找到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是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来从事这种实地的调查和研究。他最早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如果没有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的亲身的细致入微的调查,是不可能写得这样实在、深刻和准确的。1927年初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重大关头,面对着决定中国命运的农民运动的迅猛兴起,革命和反革命,革命队伍中的正确主张和错误主张,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争论。毛泽东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作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它以调查所得的事实,雄辩地驳斥了种种反革命谰言和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国民党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在实践中开辟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工农武装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作了永新、宁冈两县的调查,以此作为确定土地革命政策和策略的基础。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红四军逐渐养成了做社会调查的传统。1929年9月陈毅向中央作关于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时,特地将“调查工

作”列为红四军群众工作的第一项工作。周恩来根据陈毅报告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的信(九月来信)也特别提到:“关于调查工作应切实去做”,“这个工作做得好,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①

1929年12月,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把对调查工作的意义的认识和阐述,提到了新的思想高度和政治高度,即肃清唯心观念(后来一般称之为“主观主义”)以实现革命的正确指导这样的高度。决议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唯心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代替唯心方法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两条,前一条说的是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后一条说的是调查和研究中国实际情况。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向全党提出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了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是解决政治路线问题的基础的思想,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虽然还没有用这样的语言)。古田会议决议的这些论述,反映了党、红军及其许多领导人的集体智慧和共同经验,而又由毛泽东把它们集中起来和提高起来。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基础,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才在文章一开头就鲜明地提出了“没有调查,没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有发言权”这个后来在我们党内成为马克思主义起码常识但在当时却使人耳目一新的口号。1931年4月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的名义向红军各政治部和地方各级政府发出通知，提出我们的口号是：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是对“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口号的补充和发展，使这个口号更加完备了。这两篇文献说明，毛泽东是把这个口号作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的基本口号，在党内反复加以宣传和阐发的。可惜的是，这个口号和它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没有为当时党的中央所接受。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这个口号连同毛泽东在红军和苏区土地革命中制定和执行的正确政策，都遭到了错误的批评。所谓“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隘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的指责，就是这次会议的决议中提出来的。这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的教条主义统治中央并在中央苏区贯彻执行的结果。

经过遵义会议，在解决了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军事路线问题、政治路线问题这些迫切问题以后，为了认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为了彻底地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错误，肃清它的思想影响，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需要进一步把问题提到思想路线的高度来解决。《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提出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正是这些先导的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是把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问题提到认识论上、提到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上来系统地加以解决的必然要求，也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大视角，为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理论论

证。《实践论》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理论，揭露“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认识论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阐明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①，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矛盾论》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通过论述矛盾的特殊性，批判了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阐明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辩证法基础。毛泽东在“两论”之后，又写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它们是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解决各种军事和政治问题的时候，总是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总是同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任务。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而成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先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最完备的形态和最充分的论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且以这个思想为线索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

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术语（“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虽然主要是取其在思想作风方面的意义。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名言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

和“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口号。在1941年5月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进一步对“实事求是”这个古语的涵义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①《改造我们的学习》通篇是讲两条思想路线的对立,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这里对“实事求是”的界定,就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个高度提出来的。1941年12月底,毛泽东应当时中央党校教育长彭真请求,指示中央党校校训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并且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既是中央党校的校训,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训。从此,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实事求是”成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的、通俗化的概括和表述。

随后在全党普遍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系统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全党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这个解决是从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上来说的,也是从全党各级重要领导骨干的思想上来说的,从全党形成系统的、居于主导地位的作风上来说的),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建国以后,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使得在延安成为全党思想财富的东西,进一步在全国推广开来。全党继续遵循在延安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新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恢复国民经济、展开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规模建设和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胜利。

但是，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搞得不好，是会反复的。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就表现了这种反复。它的思想上的根源，就是违背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违背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以后，逐步纠正1958年、1959年和1960年的错误，我们党的工作又重新转到较为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个阶段我们党的工作有所转变，关键还在于首先抓了思想路线的转变。1961年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说，我们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但是最近几年我们不摸底了，大概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做得就少了，现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一年，在党内重新印发了《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党中央就认真进行调查工作的问题，给全党发了指示信，沉重地指出：近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之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调查研究，满足于看纸上的报告，听口头的汇报，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的材料作出判断和决定，这是主要的教训。还指出：“调查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不应该抱定一种成见下去专替自己找证据”，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也就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亲自主持农村调查，这样才使我们党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1958年以来农村中的许多严重错误，制定了农村工作六十条。在农村工作条例的影响下，在工业、科学、文艺、教育各方面也都制定了工作条例。这些标志着我们党在这个时期工作的健康转变的条例的产生，它的前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党重新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问题，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1958年以后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错

误，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要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在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党进一步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①。随后毛泽东又相继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一组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文字。不过，当时端正思想路线的工作没有能够彻底进行和坚持下来。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的恶性发展，个人迷信，“句句是真理”，这种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倾向也恶性发展，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通过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批评“两个凡是”错误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毛泽东过去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成为新时期到来的先导。

（二）关于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系统地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形成了我们党在一切工作中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

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却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无产阶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829页。

级的先锋队要生存、要发展、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在漫长的岁月里,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结成血肉相联的紧密关系,这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群众路线思想赖以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建党之初,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即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①。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的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②1929年9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陈毅执笔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九月来信),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就筹款工作,指出“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③;还说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也“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④。这是群众路线这个术语的最早运用。同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在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一节中也指出:“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⑤1930年3月,在《中央给广东省委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强调一切工作中应尽量采取发动群众的工作方式,同时指出,“只凭上面的命令”的“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会造成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如前所述,1930年5月的《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了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结合。1933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8页。

② 同上书第1册第406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页。

④ 同上书上卷第37页。

⑤ 1948年东北书店版《毛泽东选集》第548页。

年至1934年间，毛泽东在他所写的一些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所做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反复阐述了在革命工作中关心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意义；反复论证了只有通过切实地为群众谋利益，并且对群众不断进行宣传教育，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团结在革命政党的周围，建成一道任何反动势力打不破的铜墙铁壁。在这些论述中，他事实上已经把群众路线看作是我们党在革命活动中应当经常和普遍实行的方式和方法。1933年，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批评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倡“群众化的方式”。同年，他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强调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每个时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记群众大多数；提倡面向群众，深入群众，严厉反对只凭少数人干的关门主义、命令主义。他认为：“只有耐心的艰苦的去做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数群众的拥护”，“这样的群众工作是执行阶级路线的唯一保障”。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革命实践，对于各种工作中的一般方法问题有了一个初步总结，认识到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基本工作方法，错误的是命令主义、官僚主义，正确的就是群众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抗战，开展人民战争。这种客观形势反映在党的指导思想上也必然会对群众路线作更多的阐发。毛泽东与党的领导人在许多讲话、文章中，不断地强调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名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2页。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①——是群众路线思想在战争中的辉煌运用。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毛泽东还从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群众路线。他强调，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锋队单独冒进；必须注意组织先进分子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些论述丰富了群众路线思想的内涵。

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后，我们党进一步对在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群众路线的丰富经验进行科学总结，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想；在理论认识上实现了三大升华。

一是毛泽东在1943年6月为党中央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了具备成熟理论形态的“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思想。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80页。

识论。”^①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阐明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步骤，分析了正确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而且从哲学的高度第一次指出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意义，通过它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历史唯物论融于一体。

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把“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并且对群众路线的多重含义作了深刻论述。在党的性质和宗旨方面，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毛泽东提出：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居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③。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还提出了检验政策的标准问题。他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1094—1095页。

③ 同上书第3卷第1095页。

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①“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这里讲的虽是共产党人的政治行动准则,实际上将作为真理标准的实践标准与人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三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继续阐发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将其提到了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新高度。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为了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刘少奇还详细阐述了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四项具体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工作中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刘少奇的这些论述,进一步说明了群众路线在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中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意义,使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共七大以后,群众路线的思想在各项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地运用。

建国以后,党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在继续深化,毛泽东把它运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5页。

^② 同上书第3卷第1096页。

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在理论上又有新的发挥。他强调党领导的广大群众蕴藏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积极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他指出：过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①。1957年春，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他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②。

从党的建设角度看，强调群众路线，对于执政党有着特殊意义。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群众路线的含义作了新的界说。他指出：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思想，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创造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领导方法。在这里，邓小平的概括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延安时期的论述加以综合了，成为党的群众路线思想的完整表述。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9—460页。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地破坏了我们党长期形成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使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了重大损失。在纠正当时“左”的倾向的过程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问题。他在1959年3月几次给全党干部写信，指出已经出现“暂时脱离了群众”的危险，反复申述：“总之，要按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信中还批评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在庐山会议前期分析“大跃进”的教训时，毛泽东把群众路线和综合平衡问题，一起列为最重要的问题。但是，随后开展“反右倾”运动，这些正确认识没有坚持下来。到了1961年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的时候，毛泽东重新提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这一年4月，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把“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列为“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之一，并且提出要“向群众寻求真理”，端正党的作风。

在1962年1月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全党县以上干部七千人会聚一堂总结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在讲话中都谈到了贯彻群众路

线问题。刘少奇指出：1958年以来，群众路线思想受到歪曲，不少同志不懂得或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把一些本应体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变成了反群众路线的东西。他批评那种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像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的错误看法，说：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决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①。这个区别十分重要。建国以来，某些政治运动和经济工作所以发生偏差，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形式上的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违背了群众的利益和意愿。至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更是根本背离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导致的恶果。

（三）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催发中国革命者产生独立自主思想的特殊土壤。中华民族长期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欺凌，使一切爱国志士都会产生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自主、自强思想。毛泽东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04页。

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①。“实现中国的独立自主是一个伟大的任务”^②。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争取民族解放意义上的独立自主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又需要处理好另外一层意义上的独立自主问题，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党独立自主的问题。这是一个崭新的、极其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自己的道路，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准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有共同指导思想和共同远大理想而又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运动，是统一的世界性的运动。但是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国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各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本质上是各自独立的运动。各国共产党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依靠本国的人民群众，寻找自己的道路。统一的模式和统一的指导中心，是不能有的。但是，在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中国党内，曾经盛行把共产国际指示与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就是在同这种倾向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是一个显著标志。后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时多次说过，“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作指示”^③是不可行的；“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52页。

③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①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决定中国党的军事路线和改组中央领导机关,也是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但要彻底解决这个方面的独立自主问题,以后还经历了复杂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大发展的时期。

由于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空前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互交织,中日两国三方(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扑朔迷离。国民党一方面与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与共产党闹摩擦,坚持其反共反人民政策。为了处理好打日本与反摩擦两方面的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地运用和发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阐释了它的多方面的涵义。

从与国民党的关系上看,毛泽东针对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这个主张恰恰又是受了共产国际和外国党经验的影响),总结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指出:“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

的中心一环”^①。“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②。这里着重强调的是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这种政治立场表现在对日作战上，就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提出这个方针，首先是针对国民党的。它拒绝了国民党要我军时时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下实行正面的阵地战的作战方针，一方面坚持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另一方面从我军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我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独立自主地对日作战的自由。这个方针中关于游击战的提法后来根据情况的发展，完善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从中国抗战与国际援助的关系上看，毛泽东在1935年12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就指出，自力更生光复旧物不是说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③。在1939年9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中国抗战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过去也讲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国际环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这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这是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运用。

从克服经济困难看，由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财政经济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他指出：“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我们是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② 同上书第2卷第540页。

③ 同上书第1卷第161页。

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①。这是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在与敌顽作经济斗争上的体现。

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看,不受共产国际干预,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35年8月1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决议,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提出“一般地说,要避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的事务”^②。这以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决策包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都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作出的,尽管还要报告共产国际。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共产国际又明确肯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具有积极意义。1942年整风运动从思想理论上批判受到共产国际严重影响的王明的“左”倾错误(1931年到1934年)和右倾错误(抗战初期),实际上是独立自主原则在党的建设上的具体运用。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共中央就此问题作出的决定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随着抗战的胜利,解放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和坚持,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进一步发挥了它的伟力。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16页。

② 《共产国际文件(1929—1943)》第446页。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仗恃美国政府支持，决心发动内战，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武装扼杀在血泊之中。那时美苏之间有雅尔塔协定，“美苏必战”的叫嚷一时甚嚣尘上。苏联顾虑重重，对于我们党抗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没有明确表示支持，甚至说同国民党作战会导致“中华民族的毁灭”。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我们党一方面努力争取国内和平，一方面必须认真考虑在国民党决心对我进攻的情况下，敢不敢独立自主地确立依靠自己的力量打退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方针。这的确是一个关系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从保卫中国人民的利益出发，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① 还说：“我们是一切依靠自力更生，立于不败之地”^②。毛泽东还清醒而深刻地分析和估计了战后的国际形势。针对那种过低估计人民力量，惧怕帝国主义，惧怕世界战争，因而表示软弱的情绪和对国际形势的悲观估计，毛泽东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斗争的结果，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迟早会达成某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③。还说：“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188页。

③ 同上书第4卷第1185页。

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①“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②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觉悟起来并进行坚决斗争的中国人民,的确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这正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伟大胜利。

建国以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又有新的发展。这里主要讲两个方面,一是外交政策方面,一是经济建设方面。

还在筹备建国时,独立自主已被确立为我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③周恩来也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④“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就是为此而奋斗了一百多年。”^⑤我国政府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顶住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所施加的一切压力,维护了国家独立和主权。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在经济建设方面,建国初期提出过“学习苏联”的口号,这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必需,也的确有应该学习的地方。但是如同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4卷第1465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1页。

⑤ 同上书上卷第322页。

必须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一样，建设也必须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就是要以苏联的历史教训为鉴戒，总结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中国自己的建设路线。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1957年春，又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1958年夏，毛泽东进而提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963年9月，周恩来在国庆1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不论在革命斗争中，还是在建设事业中，都一贯采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我们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建设，都应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如此。中国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家里建设好社会主义。”^① 尽管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我们党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失误，但是这是我们党的独立探索在几个阶段和几个重大问题上走入歧途的结果。“走入歧途”错了，“独立探索”始终是必要的。从总结、研究走入歧途的教训中使我们的探索走上正道，这个任务留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来完成。

以上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介绍和评述，说明随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毛泽东思想体系内容的多方面展开，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立场、观点、

^① 见1963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方法的上述三个要点的涵义,愈益明确和丰富,并且越来越显示出这三个要点之间的相互贯通,三者统一,“三位一体”。当然,毛泽东在讲述立场、观点、方法时还讲过其他一些内容,但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说,从我们成功的基本经验和挫折的基本教训来说,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三位一体”,的确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①。又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②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③这是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要点的统一和意义的最高概括。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21页。

② 同上书第42页。

③ 同上书第371—372页。

五、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理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拨乱反正，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指导理论，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加以区别，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的新局面，在理论上使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获得了重大的新发展。对于这个新发展，可以从不同方面，采取不同方法进行归纳，但是，从其核心内容来说，就是提出和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中共十四大报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特点和历史地位作了科学概括，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

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又说:“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两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with 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为我们认识和把握这种关系提供了指针。

人类文明的任何思想理论的产生,从认识史的角度看,都是既有对以前认识的继承,又有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而作出的发展。这是认识的继承与发展的结合,或者说是认识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由此而形成人类认识奔腾向前的历史长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也是如此。就毛泽东思想而言,它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会长期地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这这就要求它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国内国外都有一种议论,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with 毛泽东思想之间,或者说邓小平考虑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路 and 观点与毛泽东考虑这方面问题的思路 and 观点之间存在着很大反差,对于说它们之间有继承与发展关系表示很难理解。

对于这个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引起许多思想混乱和语言纠缠,关键在于,人们在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实际上涉及的是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只有分析清楚这三者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两者的关系。

简单说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并且面对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有新的开拓和创造。

(一) 要分清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明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之比较的对象。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①。“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②。这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科学认识和界定的重要指导思想。经过这样的区分和界定后,只有毛泽东正确的思想我们才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他晚年的错误不属于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要纠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② 同上书第262页。

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决不是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个区分和界定,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极其重要。没有这个区分和界定,不仅不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不能清楚明白、理直气壮地坚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①。经过区分和界定,否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我们就能正确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继续把毛泽东思想当作党的指导思想。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来说,它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而只是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或者说,只有在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后才有可能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两者之间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如果说有,那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在转化的意义上,即否定了那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使错误转化为正确的先导,从而产生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路线和理论。因此,就本来的意义上说,这两者之间不存在通常讲的连续性。一些同志将邓小平与毛泽东作比较,往往只是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比较。从这样的比较中,得出的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当然不能用来说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毛泽东思想这两者的关系。

(二) 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着继承关系,即指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性和共同点。这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3页。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1. 无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还是毛泽东思想，都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一点上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准确地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简言之，可以称为邓小平创立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简言之，可以称为毛泽东创立的）。这两代领导集体之间，在人员构成上存在着连续性。邓小平、陈云在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中都是重要成员，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都参与过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事的事业，并在中央担负相当的领导责任，或是某地区、某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起着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作用。邓小平本人说得很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①就两代领导人而言，第二代领导人就是要完成第一代领导人的未竟之业，包括改正其错误。

2. 理论思路的连续性。这里说的理论思路是指大思路或根本思路，不是指一些具体的思路。就具体思路言，邓小平与毛泽东对一些问题认识的角度和侧重会有所不同，但就大思路或根本思路言，则是一致的。它不是别的，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64页。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①他反复讲“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②，“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并讲他自己就是“实事求是派”。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他又说：我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③这充分说明了两者大思路的连续性。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而言，邓小平的大思路与毛泽东的大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3. 理论性格的连续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性格是多方面的，既有不同，又有相同。就相同方面说，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强调中国特色。在30年代和40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取得伟大成功。在50年代和60年代强调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成功也有失误。在80年代和90年代还是强调这个特点，“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功。二是不固守本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强调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09页。

② 同上书第138页。

③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21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72页。

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①；一直强调单靠“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是不行的，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邓小平也有这种理论性格，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理论性格的连续性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的一个重要特点。

4. 理论内容的连续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主要是对我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的总结，这是无疑的。但是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的不少内容可以从过去的探索中找到一定的渊源。如前所说，建国以后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有两种发展趋向，其中一个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政策的积累，它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准备了一定的基础。这就是两者之间理论内容的连续性。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充分地介绍过了。尽管那时比较正确的观点和思想中，有一些后来又被抛弃了，有一些还不成熟，有一些甚至只是思想火花的一闪现，但是从科学的和历史的观点看问题，对这些体现理论内容的连续性的东西，应该给予恰当的评价。需要指出的是，讲到理论内容的继承性，绝不是说现在的理论观点全部是过去已有的；那些从过去可以找到渊源的理论观点，也绝不是同过去的完全一样。正如有种属关系的生物体内存在某种“遗传因子”一样，现在的许多思想观点同过去的一些思想观点之间也存在某种“遗传因子”或“继承因子”。这种“继承因子”在新的环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7页。

境下吸收新的养分,增加新的因素,长成新的个体,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能用僵化的固定眼光来看待这种继承关系,而应当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继承关系。

(三) 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需要指出这种发展不是一般的渐进式的不显著的量的增加,而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的飞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中国社会实际,制定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即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和长期认识的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需要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需要这个结合,以后还需要这个结合。随着任务的变化发展,形势的变化发展,认识的变化发展,这种结合的科学成果,必然不断有新的发展。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反映在思想观念上,就不能不产生理论发展的阶段性。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① 作为思想理论的发展阶段,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②,那末同样可以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用中共十四大的说法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本质没有变,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但内容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不只是细微的量的增加,而是区别出阶段性的质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的飞跃。这种飞跃,可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认识:

1.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飞跃。

毛泽东思想体系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形成的,它的理论内容主要是围绕着推翻反动阶级统治的政治革命而展开的。毛泽东思想在建国后的继续发展中也认识到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要实现由革命到建设的战略转移,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并初步地形成了一些如前所述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没能充分地、贯彻始终地实现这个战略转移,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越来越严重地走入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只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才真正实现了这个战略转移,并围绕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了一整套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逐步地形成、充实和建立起了中共十四大所论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有了成功地领导革命的理论,而且开始有了成功地领导建设的理论。

2.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但还不清晰、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较有论证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

例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思想,有些同志把它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

想渊源之一。应当看到当时这个思想并没有展开也没有着重提出,由此而应该得出什么样的实践和政策的结论都没有说明,因而不曾引起注意,只能说是一过性的认识,但的确是值得珍视的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提出和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础的内容,则有明确的界定和展开的论证。中共十三大郑重地提出要以关于国情的这个基本判断作为我们确定路线的根本依据,并且据此而确定和论证了一系列过去没有的政策。这两者之间,无论就其提出的历史背景、着力角度、具体涵义和思想深度而言,都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体现了新的飞跃。再如,关于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有如前述,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对此都有精辟的议论。毛泽东关于只要社会有需要,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没收,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些资本主义的谈话,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视角看,是个耀眼的思想火花。尽管当时主要是对个别性问题的认识,还没有当作一个普遍性问题来思索,但也表明了当时思想的开放性和政策观念的灵活性。可惜,这个思想在毛泽东那里像流星似的闪亮了一下,转瞬即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从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出发,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分”等新概念。这是理论认识的一个飞跃。党史文献工作者发掘出毛、周、刘的那些论述,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政策和理论,无疑有很大帮助。

3.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实现了由高度集中行政命令的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

跃。

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被看作天经地义,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一直被认为是区别姓“社”姓“资”的一个重要特征。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是基于计划经济而形成的。毛泽东等领导人虽然从50年代中期起也曾想对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改革,使之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但并没有想到要从根本上去突破计划经济这个理论的大框架。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个具有历史性的文件。它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这不仅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毛泽东思想的经济理论的巨大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是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完整理论体系的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之后,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共十四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这从一个重要方面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构成了一个新的飞跃。

4.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改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理论整体认识的巨大飞跃。

前面三点是就具体内容进行的分析,这一点是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作总体比较。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概括,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人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一些广为宣传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越来越从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中离去。如人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由似乎很近变成比较遥远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从历史的日程表上不断后移;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不仅由短变长(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会有多长现在更无法预测),而且由高变低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否定商品经济,到只限于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中承认商品交换,再到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不可逾越的和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由完全不承认市场经济只承认计划经济,到承认市场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辅助调节手段,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承认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由强调公有制是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形式长期存在共同发展,包括承认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由只承认按劳分配原则,到承认在以按劳分配和劳动收入为主体的条件下同时实行非按劳分配原则的必要,包括允许一定量的剥削。如此等等。

这些观念的变化,不是任何人一定要人为地、主观地强加于

现实社会的，而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提出来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这样大的变化，是过去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先辈未及预见的；但是，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实，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应而来的政策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好象是一种后退，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它去掉了许多虚幻的成分，使社会主义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大地。从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都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在总体上更加坚实和雄厚了。

总之，当前时代的特征是和平和发展成为了世界两大主题。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有可能的。同时，和平离不开发展。世界的发展决不能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同世界要和平一起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这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这使我们国家不能不有一种紧迫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的经济处于停滞和缓慢发展状态，同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如果我国经济不能扎实地较快地发展起来，如果妨碍经济发展的旧体制不坚决改革，那末，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会遇到极大困难。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①“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76页。

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出发，通过总结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和挫折的实践经验，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大胆地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包括：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自己道路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发展的内部动力论和外部条件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发展的政治保证论，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步骤论，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论，以及经济特区论，一国两制论等等。正如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的：“十四年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更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 international 的观察中认识到，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正确的，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由基于正确解决中国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而建构起来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上不能不形成巨大的飞跃。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对于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开放型的科学体系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还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在实践的不断检验中，继续丰富、完善和发展。在中国，这个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源远流而流长。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40页。